

首都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研究

姓名：谢金伶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专门史

指导教师：宋卫忠

20080501

中文摘要

服饰变化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氛围、人们的精神风貌，反映特殊时期社会环境的剧变，北京作为历史古都之一，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的变化更能体现特殊历史时期生产条件、社会风尚、社会心态的急剧转变。自晚清起就开始混乱的传统穿衣体制伴随着民国的建立而被真正打破，“旧制既破、新制未立”，故北京乃至全国都进入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服饰穿着年代，至 30 年代后服饰上渐趋稳定。在这一历史时期，北京服饰变化中呈现出服饰表现形式上的新旧杂陈、中西并存性，人们对服装选择上的从众性和盲目性，同时带有浓厚的保守性。

而影响服饰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活跃、开放的社会新思潮的带动，亦有保守势力对传统的保留，同时也有城市积淀已久的固定社会结构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此时北京在服饰上并不是一个太积极的变化过程，或者由当时政府强令推动，或者受上海潮流的带动，大量传统成分的存在导致在服饰上含有消极因素和惰性色彩，缺乏自主更新的内在动力。在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探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的变迁，对如何看待服饰“殖民化”，如何看待“西风东渐”问题，以及我国如何建立自己的服装体系、衣生活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北京、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rappings can reflect the atmosphere of an era, style and features of people and the tremendous change of social surroundings during special period. Peking, as one of the ancient capitals, the change of trappings in it during 1920s and 1930s can embody more about the sudden change of productive condition, social prevailing fash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during special historical phase.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dressing began to be jumbled from the last stage of Qing Dynasty, and it was broken along with the foundation of Min Guo. 'The old system was broken, but the new system hadn't established yet.' Therefore, Peking,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enter into an age of disordered dressing. After 1930s, trappings became steady-going gradually. During this historical epoch, the change of Peking trappings presents a kind of that those new and old,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elements co-exist in the form of trappings representation, and people went with the stream and were blind in the choosing of trapp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d a dense conservatism. Thos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change of trappings are various, such as, the driving of the active and exoteric new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and also, the reservation of conservative force to the tradition, and simultaneously, the influence of the fixed social structure which had settled for a long time in cities. On the whole, at this time, it was not a very active change process of trappings in Peking. It was forced by the strong command of temporal government o driven by the swim of Shanghai. The existing of plentiful traditional components induced that there was negative equation and inertia colour, and it was short of immanence motivity of independence renovating in the aspect of trapp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al gleichschaltung, discussing the variance of Peking trappings of 1920s and 1930s has definitely reference and praxis meaning for treating the 'colonization' of trappings and the problem of Occidental culture spread to orient as well as how to establish the systems of trappings and clothing life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Peking, trappings, cheong-sam, long gown, sun yat sen's uniform.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谢金伶

日期：2008年5月9日

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谢金伶

日期：2008年5月9日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说，人类的服饰是人类文化最早的物化形式之一，服饰既以特定的物质形态为前提，又体现着精神文化的深厚意蕴，其不但具有御寒、避体之实际功用，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外在风向标。正如法国美学家巴特所说：“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语言”^①。以服饰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心理、审美意识、价值取向与服饰变化的内在联系，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服饰变化产生的影响，不但能更加清晰地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的社会生活，充实北京的城市历史文化宝库，更有助于拓宽我们对社会史研究的思路，弥补服饰史与文化史交叉研究的不足，并为美学、城市学、社会学尤其是北京近代化的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服饰演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透过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服饰研究，不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情感、主观意愿、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还可以了解每个时代社会成员的普遍心理和民族的精神实质。中国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服饰的发展体现了历史文化的沉淀和国别特征；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以其近千年的国都史，由“服饰”这面时代的镜子反射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传统文化中闪耀着的“地域性”亮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的“旧，死而不僵；新，方兴未艾”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旧并存性。而此时北京市民则经历了对穿衣由杂乱无章到有秩有序、由固守传统到模仿西方而中西合璧的转变过程，在体现鲜明时代特征的同时，呈现出很大的包容性、两极分化性和浓厚的本土性。鲜明的吸收力和放射力使之既能集各民族、各地区之大成，又通过融合、改良、再创造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服饰特点，这是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在人类文明空前发展的今天，文化品位“以人为本”的需求理念日渐高涨，北京的服饰也愈来愈追求多元化和个性化。

二、研究概况

对服饰的研究记述，中国古代史籍中就不乏其数，有以描述服饰形制为主的，如各朝正史中的《舆服志》、《车服志》和《礼仪志》等；有以记载服饰制度、服饰礼俗为主的，如主要集中在历代典制文献中的《通典》、《唐会要》、《明会典》等。而专门的研究专著，似乎始于宋代方凤的、研究古代士庶服饰的《野服考》，之后还有宋代论述丧服制度的《内

^① (法) 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1—22 页。

外服制通释》、清代研究古代纺织品的《释增》等等，这些都是从服饰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部分进行研究的记述或专著。而现代意义上对服饰史的研究专著，则以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代表。此后，以服饰为中心，以研究服饰文化、服饰艺术、服饰美学等方面的论著在改革开放后大量涌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华梅所著《人类服饰文化学》和徐清泉著《中国服饰艺术论》。而不同的学科中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服饰进行研究，但都仅结合自身学科特点来解读“服饰”这本大百科全书，如民族学较为关注少数民族的服饰形制以及服饰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民俗学着重研究服饰的习俗；人类学更多关注服饰的符号象征意义；社会学主要研究服饰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心理学则倾向于从理论上为服饰流行寻找依据。

从以上的研究现状中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学术界各研究专著中，或从服装学的角度，用文字、图片等总体介绍服装的样式、制造方法，如华梅之《中国服装史》、王东霞之《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纳恩之《服饰时尚 800 年：1200-2000》等；或在讲述中国文化风俗之时，将服饰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简要介绍，如陈登原之《中国文化史》、胡朴安之《中华风俗志》、李家瑞之《北平风俗类征》、邓云乡之《燕京乡土记》；或定性地解读被学科化了的服饰，如王继平的《服饰文化学》、华梅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徐清泉的《中国服饰艺术论》、张竞琼的《服装艺术—衣品如人品》等；或虽有对服饰史的专著类介绍，但却将时间断代于中国古代，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锡保之《中国古代服饰史》，袁杰英之《中国历代服饰史》、黄能馥之《中国服饰史》、周汛之《中国古代服饰风俗》等；即算是有综合研究服饰与社会、文化的，亦是就中国整体情况而言，未有凸显城市性或地方性，如华梅之《服饰与中国文化》、陈丕西之《服饰文化》、戴平之《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王维堤的《中国服饰文化》、楼慧珍等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仲富兰之《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等。

而以服饰为中心的各学术论文中，从研究主体上看，要么以一个时期的整体变化为主题，如李玲的《民国初年服饰风尚》，袁仄、区伟文的《历史选择的服饰——有感于民国初年的服制法令》，徐逸、董薇的《浅议民国时期服饰变革的意义》，刘宁的《中国近代服饰的审美变迁》，张法的《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等；要么以一个社会群体的阶段服饰变化为主题，如吕美颐的《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罗苏文的《清末民初女性妆饰的变迁》，蒋雪静的《民国西化运动中的女性服饰风尚》，金炳亮的《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张俊华的《民国初年的女性解放与妆饰的变迁》，朱红梅的《中国女性服饰与妇女解放刍议》，余晓宏的《从妇女服饰看近代上海社会变迁》等；要么以服饰

中的某一客观主体为研究对象，如安文新的《长袍马褂·中山装·西装》，郭慧娟的《民初京城旗袍流变小考》，包铭新、高冰清的《论晚清民国时期围系之裙到套穿之裙的演变》，盛羽的《旗袍的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初探》等，施善平的《中山装的来历》等；要么以地域服饰为研究对象，如秦永洲《近代山东服饰变迁述论》，石磊的《近代上海服饰变迁与观念进步》，罗玲的《民国时期南京的社会风尚》，刘宁波的《北京服饰文化述略》等。

就笔者看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以服饰为主题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属于通史性或某时期的综合性研究，有的侧重服饰款式的变化、注重服装设计、服饰美学领域的讨论，而忽视服饰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在这种孤立的、以“国”而不是以“地”为分界点的研究方法指导下，研究成果中涉及北京服饰的很少，有的虽有所涉及，但往往是零散的和不全面的，因而也就很难全面系统地探讨服饰与审美、与心理、与文化等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对各个时期或相同时期上海的服饰研究较多，包括服装样式、服饰内涵等，由浅至深，成果比较丰盛。从时间上说，学术界尚未出现从地域角度出发，研究城市服饰变迁的专著，更别提分时期讨论某一城市服饰的总体流变或时代特点的研究成果了，有的也只是总体上从一个社会群体的变迁角度着手，概而全国。要知道，社会是多样化的，绝不是用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服饰就能一概而全的。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中国服饰史和中国社会文化史已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综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二者的交叉地带即服饰社会、服饰心理，尤其是区分地域特征的服饰研究而言，尚存在继续挖掘的空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当时北京服饰状况，无疑能推动北京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史料发掘整理，从观点上重新研究，整合以往分期带来的断裂感和笼统导致的模糊性，全面系统介绍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的变迁。

三、题目解析

题目中“二三十年代”的时间范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从 1920 年到 1939 年，但本文中所涉及的内容是从民国建立起的服饰之变一直到 1937 年的“七七事变”。选取这一个时间段，是因为长久以来规范、威严的代表——北京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经由了一个由稳定——失序——稳定的发展阶段，这在服饰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破旧立新”中，北京以独有的地域特色追随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迈进了现代化的大道。

“服饰”的最早连用是在《周礼·春官》篇中，《春官·典瑞》云：“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①指的是衣服及装饰。在现代汉语中，“服饰”一词指衣服和装饰，这一

^① 《周礼注疏》卷 20，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83 页。

定义虽简单但不是很明确，对于冠、帽、鞋、袜，有人将其归入衣服类，也有人将其归入装饰类，使用有些混乱。目前相关学界使用较多的是华梅对服饰的定义，将服饰分为四类，第一是衣服，有主服(遮覆躯干)、首服、足服等；第二是佩饰，指全身起装饰作用而不具遮覆功能的饰品；第三是化妆，既指带有原始性的文身、割痕等，也指令当今的美容；第四是随件，如包、伞、佩刀等。^①笔者认为，服饰作为一个产业，从制作上而言，还应包括服装款式上的改变、所用布料的变化、裁剪手法的新旧及服装上图案纹样的繁简等。

服饰的创造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社会意识、文明程度、劳动方式、宗教信仰、历史背景、审美情趣、伦理道德等的综合反映，或者说服饰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本文仅从款式和布料两个方面，选取领袖、市民等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的流变，总结此时北京服饰变化的盲目保守、时间滞后等的国都特征。通过对服饰表层现象的剖析，挖掘服饰变化行为背后潜藏着的服饰穿着观念、审美取向以及从众的社会心理等内部因素对此时北京服饰变化产生的影响。

而北京的称谓在此时期内有变化，自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日起至新中国的成立，北京改称为北平。从大的方面来说，“北京”与“北平”变换的只是称谓，所指一致，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除历史专用名词或所引史料中之称谓外，有提到“北京”或“北平”的地方一律用“北京”。

四、选材说明

本文通过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的综合叙述，通过对根植于特定时代文化模式的表现形式——服饰的研究，来呈现北京的地方性特色，进而丰富北京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关于北京服饰的记载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民国期刊或图书资料中，有关服饰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论著或学术论文中，本文选取的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案史料中可能涉及到的对服饰穿着或样式的规定，尤其是民国颁布的服制政策法规；二是散见于民国时期在北京和上海出版发行的各大报刊和相关杂志中对当时社会服饰的文字描述；三是杂记于在北京生活过的文人学者的笔记、回忆录中些许的记忆；四是各服饰类专著中引用的图片或老相片；五是当时画报中有关服饰的广告图片等。

^① 华梅：《服装美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年，第 239 页。

第一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概述

民国不到 40 年的短短历史，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既激烈冲突又日益融合的历史时期，体现在服饰上就是，其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几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这个急剧变化尤以二三十年代的服饰变化为最，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出现了不同的服饰，而延续的同类服饰在样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节 渐变时期（晚清）

中国乃礼仪之邦，礼仪体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服饰亦自古就是礼仪的外在表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①“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让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缙。故圣人处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②服饰的文化象征在各朝各代统治者的法令下，完全转化和服务于突出等级的标志或符号，成为权力的代表，“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③“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④无一例外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从周公始，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使之系统和健全，借此维护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这对即便是“异族”的清朝而言亦不能免俗，清朝统治者亦用服饰区分尊卑贵贱，将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中。

但到了晚清，随着国门的洞开，西方生活方式的输入以及先进人士的大力提倡，人们开始注意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服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北京作为当时清王朝的首都，相对于直接受欧风美雨强烈熏染的东南沿海开埠城市，变化相对较小，尤其在国门初开之时，如同治年间，仍保持着褒衣博带的传统服式：“时兴马褂大镶沿，女子衣襟男子穿。两袖迎风时摆动，令人惭愧令人怜。”、“英雄盖世古来稀，那像如今套裤肥？举鼎拔山何

^① 《春秋左传》卷 56，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46 页。

^② 《后汉书·舆服志》志 29，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640 页。

^③ 《周易》卷 8，（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74 页。

^④ 《周礼注疏》卷 2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45 页。

足论，居然粗腿有三围。”^①但随着国门的渐开渐大，服饰上也渐渐开始出现变化，服制日见荒疏之象，如礼服简化，袖口去掉马蹄式，有的在衣袖之间装假套袖，使假袖口层层叠落，一为显示身份和地位，二则加强旗装的封闭形式，凸现窄袖修长之感。晚清服饰的变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男子剪辫、女尚男装及女学生装的出现了。

一、以剪辫为代表的男子服饰

具体来说，清朝中后期北京城里的男子盛行穿“四不像”，即所谓“炎伏大衿袍，多用黄葛纱，而无马蹄袖”的袍褂，还有半臂加左右袖、前襟横装一字排扣、套在袍子外面穿的“巴图鲁坎肩”（巴图鲁在满语中意为“勇士”），亦称“军机坎”^②，捻襟马褂和琵琶襟马褂亦盛行于市。到了清朝后期，“国之典礼，莫重于章服，而今之章服之紊亦已甚矣。车于陆，舟于水，皆洋式也，……倭其冠，洋其履，德、法其衣裳，皆洋工也。”^③且原只有有军功、爵位或特旨赏赐者才可戴之花翎在开捐例后，尽人均可捐而得之。“初唯有近侍、宿卫有之……昔日汉臣赐翎者甚少，……自捐例开始，人人可得其极也，仅费二百金，故外省官员，几于无人不翎矣。”^④若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晚清服制上的日趋崩溃，那么最具变革意义的莫过于剪辫了。

清代官员身着长袍马褂、顶戴花翎、脑后蓄辫的服饰特点，在当时东亚中华文明圈内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中，似乎还能带有些许唯我独尊的特殊优越感，但当其走出国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事活动时带来的却是麻烦与尴尬：一次，郭嵩焘出席外国人的茶会，一位外国妇女“忽觉有触其颈者，觉其物松软，奇痒不可耐，按之不得，四顾又无所见。已而复燃。再三察之，始知中国钦使之花翎左紫右拂也”^⑤有时甚至带来嘲讽和羞辱：一位驻欧使馆参赞去公厕时，有人“见其乌辫垂垂，纱衫宛宛，疑为女子误入男厕也，……携入女子厕中”，一外国妇女认出其后嘲讽道“支那女子竟得为外交官，吾辈当开会欢迎矣”^⑥。一些先进国人从各种角度提出改变传统服饰及发型的主张，如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呈交的奏折中提出：“奏为请断发易服改元，以与国民更始。……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究衰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也。”^⑦在维新派的倡导下，北京早在宣统年间就出现了剪发之人，“弹冠相庆一时新，海内同风有几人？

^①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页。

^② （明）史玄、（清）夏仁虎、颀名：《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30页。

^④ 转引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453页。

^⑤ 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第2册，卷四，上海书店，1981年，第95页。

^⑥ 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第2册，卷四，第100—101页。

^⑦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收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63-264页。

最是当僧又还俗，一身变化两层身。”^①但在受传统文化影响力和封建伦理控制力较强的北京，“敢为天下先者”还是不多见的，作为对封建主义的一种挑战，剪辫易服必然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拦，因而剪辫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到了20世纪初，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过“革命”的大旗，更为直接、积极地倡导剪辫易服，在他们看来，这是民族主义与主权自由之所在，是排满的具体体现，更是动员群众革命的有效手段。当时，许多先进人士呼吁“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②，均以剪掉发辫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以孙中山在日本断发易服为首倡，陈少白、章太炎亦纷纷除辫，“剪辫”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大批出国留学青年在国外接触了新的生活方式后，更激发了内心追求、模仿进步生活方式的愿望，剪掉发辫后开始着西装、改西式发型。留学生们从国外带回的剪辫之风不仅波及学界，还影响到军界，尤其是1905年新编陆军改变军队服式，更为剪辫提供了借口，一些相对保守派迫于社会压力，只是剪去一束头发，将剩余部分盘起塞入帽中。国内剪辫之风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1910年资政院通过允许剪辫的决议案，使剪辫之风突破学界、军界，迅速演变为一场从南到北遍及全国的群众性运动。与剪发相配套的穿着莫过于西装了，但最初绝大多为进口，早在光绪年间虽出现过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洋裁缝”，但多因初学未得要领：“新式衣裳誇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著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③1904年上海“王兴昌记”才诞生中国人缝制的第一套西装。

二、女子废缠足及女子服饰上的变化

女子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陋习，清朝统治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对妇女从精神到肉体的禁锢，甚至企图以汉族妇女不缠足作为推行满汉联姻的前提；但嘉庆年间，镶黄旗汉军之女已多有缠足者；道光年间，不少满洲旗人妇女竟然“仿效汉人缠足”^④。缠足与辫子同作为旧制度的符号代表，废缠足与剪发辫同成为晚清服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看来，缠足与“弱种”、“弱国”紧密相联，“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羸弱纤缕，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⑤缠足不但有害女性身体健康，进而损害孩子健康，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族。或许相对于辫子本身与政治、伦理的关联性，小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礼教社会产生的特殊审美观，与社会风俗相关，因而在革除过程中也就相对顺利。在时人进步观念的倡导和带动下，从

^①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第144页。

^② 程英：《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中华书局，1962年，第547页。

^③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第136页。

^④ 转引自袁焘：《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⑤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收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43页。

开明先进者到观望守旧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广放足。然在此时的北京城内，此风却仍未大开，“坤鞋制造甚精工，争奈人多足似弓。庚子已过尚依旧，几时强迫变颞风？”^①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北京妇女以缠足致累，然事过辄忘，积习难返，虽设立天足会，但主持其事的男子们却思想并不坚定：“脚根不定欲何之？一失足为千古讥。莫向女儿身上看，最无把握是须眉。”^②废缠足运动是“足部的革命”，带来的是各式女鞋的出现，尤其是受欧风美雨影响出现的高跟鞋，这在后文中有提到。

而在女子服饰上，在清朝统治者“男从女不从”的默许之下，一直是满汉分途、各具特色。满族女子的典型装束是“梳两把头、身着外套马甲的蔽足旗袍、脚穿花盆底鞋”，汉族女子则是“平头圆髻、上袄下裙，脚穿弓鞋”打扮。在历史的长河中，满汉之间既有明显分途，又有局部的渗透和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相当缓慢，一般表现在式样的翻新、肥瘦长短比例的变化、纽带位置的变更、衣裤鞋帽的协调、色调的搭配以及装饰物的选择等方面。如自道光经咸丰、同治到光绪中叶，袍服、袄衫样式无大变化，仅衣下摆之长短、袖之肥瘦、领之高低一变再变。有记载云：“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又尚宽长，……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妇女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大口至尺二、三寸）”^③。到了光绪年间女袄衫“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不能屈伸”^④。袍领时高时低，坎肩之领时有时无，后又日渐加高，同时花边使用十分盛行，流行多而宽的镶滚，从二镶二滚到五镶五滚，“咸同间，京师妇女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⑤人们形容当时女装是“鬼子栏杆（即花边）遍体沿”。

作为汉族妇女所穿之裙的制式亦多有变化，早期风行的凤尾裙已不时兴，咸丰、同治年间有一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并广为流行。《光绪都门纪略》“时样裙”诗：“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费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着鱼鳞百褶裙。”^⑥此外还有动能听声的“叮噹裆裙”、美如其名的“百蝶裙”、“绣凤凰裙”、“金泥簇蝶裙”等等，随着洋布的传入，以西洋印花布为料的“洋印裙”亦很流行。至光绪年间，满族妇女的服饰急剧衰落，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旗中妇女“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⑦，着裙者渐

^①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第134页。

^②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第153页。

^③ 转引自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见《史学月刊》，1994年第六期，第47页。

^④ （明）史玄、（清）夏仁虎、颉名：《川京琐记》，第30—40页。

^⑤ 徐珂：《清稗类钞》，第一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187页。

^⑥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第240页。

^⑦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第241页。

趋减少，兴起上袄下裤，裤管末端镶有花边，并逐渐以甩腿裤取代绑腿。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摒弃长久以来的男尊女卑观念，改变妇女所处的地位，一些女革命者在服饰上兴起了“女穿男装”之风，并身体力行，众所周知的中国近代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就爱着男装，不管西式还是中式，日本女士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在北京时的装束时是这样描述的：“穿着西式男装，横戴着黑色的鸭舌帽掩盖了半个耳朵。蓝色的中世纪西装，背心显得很不合体，因为西装袖子太长，纤细的手指露出一点在袖口外。手中带着一根细手杖。从又肥又大的西服裤下面，可以瞧见茶色的靴子。胸部的领带松松的往下垂，”俨然一“男装的美人”、“她穿着蓝色的男长袍，气宇轩昂，骑在马上英姿，真是威风凛凛，使人完全感觉不到她是一个女子”^①。（图1）如秋瑾般“女尚男装”的还有妇女活动家张竹君等，一时间，女扮男装的打扮在北京大街上、酒楼、戏院甚至青楼中处处可见，这其中有妓女、有社会妇女、亦有女学生，连闻名一时的肃亲王的大格格保书航都常越闺范，着男装出现于各种公共场合。

20世纪初，人们从许多新的角度，提出了变革服饰的要求。一些有见识的女性提出，衣服应与职业、身份相称，职业妇女人数虽少，但女学生的数字却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全国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其中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教会女校学生”^②。新式学堂中的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明确提出不缠足和服饰整洁的要求，设有体操课的还要求穿统一的“操衣”。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中，选择了三幅宣统年间女学生装的图像，均着无任何镶饰的窄袖袄，长裤，脑垂辫，其中五人中有三人戴着鸭舌帽或有帽沿的分辫帽，这或许就是此时的一般女学生装束。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更是学堂的云集、新兴之地，女学生装是否由北京而广及全国虽善未考证，但相信在当时应该是穿着最多之地。



图1：秋瑾（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72页。）

第二节 相对混乱期（1912年—1927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结束了清王朝200多年的统治，绵亘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随之灭亡，中国旧有的衣冠体制也随之瓦解，传统服饰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而逐渐蜕变。辛亥革命成为中国服饰上的又一转折点，其取消了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废弃了

^①（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丽编译：《中国女性史》，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② 陈翔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第100页。

几千年来以衣冠“昭名份，辨等威”的典章制度与传统习惯。皇帝的龙袍、皇后的凤冠、文武官员的补服，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民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一个服饰开放时代的到来，过去以礼仪、等级为核心的服饰文化开始向以审美、个性为基本理念的新服饰文化过渡。但过渡往往是在摸索中前进，是不稳定的，故自民国建立到1927年，北京的服饰是杂乱和无序的。

一、首开民风之男子服饰

（一）官方确定之服

中华民国的成立，必然要求从外表上与清王朝彻底脱离关系，服饰的改变就是这一要求的外在表现。然而随着剪辫易服对满清官服、顶戴的捐弃，国人一时在服饰上失去了“风向标”，鲁迅先生在当时就曾对“穿衣”提出困惑，若“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①这亦是民国政府的困惑。但很快，1912年10月，刚迁至北京不久的民国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服饰法令，即《服制》，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做出具体的规定：“男子礼服分为两种：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即西方的礼服，有昼夜之分。昼服用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衩，用黑色，穿黑色长过踝的靴。晚礼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图2）裤，用西式长裤。穿大礼服要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晚礼服可穿露出袜子的矮筒靴。常礼服两件：一种为西式，其形制与大礼服类似，惟戴较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另一种为传统的长袍马褂，均黑色，料用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②该服制颁布二十天后，民国政府又公布了《陆军服制》及《陆军官佐礼服制》。新式陆军制服从样式到剪裁完全西化，“主要五科步、骑、炮、工、辎系按国旗颜色”^③。服制对帽章、肩章、便服、外套、士官生服和讲究的军礼服作了详尽的规定。之后至1919年（民国八年）期间，民国政府又颁发了十余项服制，简录如下：《推事检查官律师书记官服制》（民国二年一月六日）、《外交官领事官服制》（民国二年一月十日）、《海军服制》（民国二年一月十八日）、《修正警察服制》（民国二年五月十五日）、《铁路职员服制规则》（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订陆军常礼服并增兵科颜色文》（民国六年一月三十日）、《矿业警察制服等级臂章令》（民国八年四月四日）、《遵订祭祀冠服文》（民国八年九月九日）、《航空服制》（民国十年五月一日）等等^④。

有一篇回忆录里较清晰地描述了当时袁世凯穿着的军礼服，那是1913年10月10日，

^① 鲁迅：《洋服的没落》，见《鲁迅杂文全集·花边文学》，河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11页。

^② 《政府公报》，1912年10月4日

^③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535页。

^④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第1530—1541页。

“这时有戴全金线军盔、着蓝色制服、佩带军刀的卫士三百二十名排队走入大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皆着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皆着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最后袁世凯乘着八人抬的彩轿到来，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礼服亦钴蓝色，金线装饰甚多。”^①（图 3）服饰的完全西式化成为民国初年的特有标志，在 1918 年 10 月的徐世昌总统就职典礼上，也是全部英式爱德华式时期风格，当时《新申报》的报道专门用粗一号的铅字强调新总统“著燕尾服佩带勋章”^②。



图 2：燕尾服（此图摄于长春伪皇宫）



图 3：着军礼服的袁世凯（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4 页。）

（二） 西装与长袍马褂

民国公布的各项服制条例中，未对平时便服作具体规定，一如孙中山所指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③，无论款式、颜色都不受限制，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故相对于特殊场合或特殊人群的官方礼服，穿着最多的当属洋装派的西装与保守派的长袍马褂了。早在辛亥革命前，西装这种新事物已经传入国内，为当时国人熟知。民初颁布的礼服服制多适用于官员就职、授勋或外交场合穿着，代表新思潮的“西装”便悄然行走在政府各部的府邸里，尤其是政治中心北京。“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革冠革履，呢服羽衣……政界中中，相互效法，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④当时的政坛要人章宗祥、陆徵祥、周自齐、朱启贤、曹汝霖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鞋，提起了手杖，1914 年在北京中央公园游园时，俨然一副洋绅士的派头。”（图 4）《近代名人图鉴》

^① 唐在礼：“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见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90 页。

^② “新总统就职大典记”，《新申报》，民国七年十月五日

^③ 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1—62 页。

^④ 《大公报》，1912 年 6 月 1 日

收录的唐绍仪内阁全体 10 人全影中，有 7 个人穿的是西装，此外，像溥仪、载恬等满清贵族都有西装照留世，商界中亦多着西装。从穿着场合来说，西装多见于各类洋式场合或出入洋行的人身上，多为头戴礼帽、脚蹬亮面皮鞋，上衣小兜里掖一块折叠有致的手帕（深色西服必须配白手帕），颈间系着领带，领结。与之相配的有各种装饰的领带卡、坎肩、背带也是一丝不苟。讲究者胸前垂着金壳怀表的金链，上面装饰着宝石雕成的小桃，石榴或翠玉琢成的白果、香瓜等。手上要戴各种石头的戒指或素金戒，出门则讲究戴上白手套，还要提着“司的克”（即文明棍）以显示风度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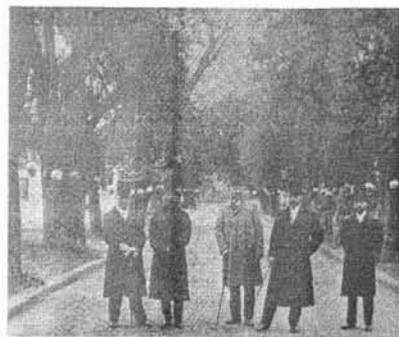


图 4: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26 页。)

而上流社会的西装穿着成为当时北京求“新”派们的模仿对象，教师、青年学生、洋行和机关办事员们亦多为洋服打扮，当时北京的“洋派学生，外面穿大褂、袍子，里面穿条西装裤子，这在当年是非常流行的时式服装了。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的夹着洋文书的大学生，几乎统一都是这样的服饰。”^①社会“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②甚至北京的周边县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③。在崇洋风气的影响下，突显干练、明快、精神、朝气的西装在北京迅速流行起来，正如郁达夫所云：“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中国人也非学他们不可了，于是乎阿狗阿猫，就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靴，捏起了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④

但或许民初国会在制定礼服时，并未考虑过“西洋化”礼服的不实之处，北京属北方城市，天气较寒冷，“华人惯用丝棉羊皮，今如西式之衣，层层均系单夹，于天寒亦殊有碍。”^⑤“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⑥在寒日里着西装略显单薄，有追新求异的，仿长衫式样，在外加一件具有京式风格的大氅（斗篷），“年来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数，比之以往，可加及数倍。”^⑦需求量增加的原因虽不确定，但似乎与西装的时兴不无关系。

而同作为常礼服的长袍马褂在穿着上抛弃了等级差别，形式上相对于清代的臃肿肥大来说，讲究量体裁衣，袍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两雨，在左右两侧的下摆处开有一尺左右的

^①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第569页。

^② 《申报》，1912年7月15日

^③ 中山服此时虽有出现，但仅小部分人穿着，且形制不稳定，后文中将详细介绍。

^④ (日)山内智慧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转引自孙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服饰变革》，见《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8页。

^⑤ 郁达夫：《说模仿》，见《郁达夫文集》（卷八），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

^⑥ “服饰刍议”，《申报》，1912年1月7日

^⑦ 《申报》，1912年7月15日

^⑧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1，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35页。

小袄，一般在其外套一件对襟窄袖、长至腹部、袖与袍齐的马褂，头戴瓜皮帽或西式礼帽，配中式长裤、皮鞋（图5）。在日常穿着中，传统生意人用高档的丝绸为布料，一般乡村绅士则采用中档的传统面料，即使天气寒冷，外套穿庄重、威严的大氅，足以御寒。（图6）直至二三十年代，“上自国务总理，下至贩夫走卒，则统统是‘国粹’服装，中式衫裤、长袍马褂”^①。民国政府在急于废除封建等级服饰之时，亦或没有想到“洋派”服饰在已刮“西风东渐”之风的北京会对中国传统有如此大的猛烈冲击，“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褂袍亦得暂时适用。”^②长袍穿着上无过多配饰，可作礼服亦可作便装，自民初定型后无大的变化，在北京占居着重要地位，北京大学曾明文规定以长袍为校服。



图 5: 穿袍、马褂的富裕阶层（摘自袁仄：《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图 6: 依季节不同，长袍外或罩马褂，或套马甲。马褂和马甲均为立领、对襟、五粒钮扣，其样式已经与清代不同。（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图 7: 民国常见男子发式（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①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第569页。

^② 民国政府参议院：“服制条例”，《申报》，1912年7月15日

自清末就倡导的剪辫之风，必然导致男子发式和冠帽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当时社会为个性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男子短发样式多借西洋式，有留齐耳短发披于脑后的、有中间分开梳于左右的，还有后梳式、一边倒式、左开叉式（图7），更甚者剪为短平头或剃光头。而和发式相关的冠帽，同样展现出了不同的个性特点，除了职业装如军警帽外，往往由人喜好选用。西式礼帽多与西装搭配，瓜皮帽或硬檐列宁帽与长衫相称，工人中有戴帽者以鸭舌为主，冬季里还有皮帽，下雪时可将平时翻上的前檐和两侧翻下以取暖（图8）。



图8：民国常见男帽（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第145页。）

此外，民国初年，在南洋华侨中还一度流行“企领文装”，此服饰在留洋学生中也非常流行，故被内地人称为“学生装”。此种服式沿用了西式服装三片身和袖身分开剪裁的服装式样，一般不用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单层方式立领，对襟、五扣、长及腹下，在衣服的正面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的胸前还有一只外帖兜袋。其不系领带、领结，穿着起来显得简洁、干练，给人朝气蓬勃、庄重文雅之感。这种着装既无传统长袍马褂的拖沓和缺乏生气，又无西装的过多讲究和不尽实用，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喜欢，后经改造还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同时，盛行于市的各类服饰在下层劳动者中影响甚微，他们仍旧是上穿对襟小褂和短袄，下穿中式长裤、白布袜和黑布鞋的传统中式着装，且款式简单、色彩较单一，手头宽裕的会在所用面料上“追洋”，用仿绸或带暗花的布。

二、帼国不让之女子服饰

民国公布的各项礼服中，对男子礼、冠、服、履都作了详细规定，却独把妇女摒之门外，仅提出“女子礼服一式，是齐领对襟长上衣、下服打裯长裙，俗称百裯裙。在长齐膝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得加以锦绣。裙工为中置阔幅，然后连幅分

向左右两侧打袖，上置裙带系腰。衣和裙的质料，用色，皆无规定。”^①新制服公布以后，引发女界纷纷议论：“女子服饰迄今未定夺，殊欠大雅”、“遇有庆吊大事，无礼服可用实大不便”，对此，参议院却迟迟未定论。直到1913年初，伍廷芳邀集女界共同研究，草议出女子礼服服式：“照公布图样，长过膝一寸，袖宽六寸，出手齐手腕”、“衣带已出阁者用紫红色，未出阁者不拘颜色。便服齐膝，袖长手腕，袖宽四寸，腰身稍宽，领高不过二寸。”^②还未等民国政府表态，女界名人们便付诸实施了。

但因当时中国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并未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一并全部清除，女子依附于男权的地位未有根本性改变，女子未能真正走入社会，礼服虽有，但基本无穿着机会，即便有穿礼服的场合，亦是达官显贵之富太太们平日里的消遣，仅是社会上层中的少部分人，部分保守人士依然穿着旧式旗袍，“除了少数土著妇女外，大都转为虚华”^③。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女子服饰抛弃清代繁复绣花镶边的装饰，崇尚简洁便利之风兴起，上衣下裙和上衣下裤成为女子的时兴装束，“1912年左右，流行女短上衣的着装，裙、裤倾向于用牡丹、海棠、梅、兰、菊的大花纹布料。”^④同时，满人之旗袍亦在时代的车轮中步步改良，彰显女性魅力。可以说，自民国建立至20年代的北京女性服饰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穿着形式，文明妇女追求端庄、得体，社会妇女崇尚新奇、华贵，尚女权者中意西式服装，女学生则简朴素淡，式样较男子丰富且礼节约束力小，往往能各行其好，并开始意识到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

（一） 剪发与文明新装

在民初男子剪辫大潮中，妇女没有剪发要求，她们或留辫子，或盘发髻，颇多讲究，当时北京还出现了一种专门替妇女梳头的女佣，人称“梳头夫人”。至1916年，妇女发髻式样多达20余种，除流行的东洋髻外，还有“冲天髻”、“共葵花红”、“子母结”、“牧羊结”、“燕尾髻”、“蝴蝶须”、“蜗牛髻”（图9）、“半朵梅花”、“三星髻”、“双龙髻”、“高丽髻”等。^⑤但无可否认，发髻的最大特点是头发长而密，盘发髻还必须在发髻上喷洒香水，涂抹生发油，既易染垢也不易清洗，况且每天梳理清洗，并装饰金珠翡翠，既费时



图9：左图为“蜗牛髻”，突出了面部，提升了身高；右图为时尚发型与装饰（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112页。）

^① 《政府公报》，1912年10月4日

^② “女子服饰之商量”，《神州女报月刊》，第2期，转引自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54页。

^③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1926年，第43页。

^④ 转引自黄强：《中国服饰画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

^⑤ 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费力又费钱。

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萌芽，妇女们不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和家庭的牺牲品，而是穿长裤、剪短发，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这股风潮的推动下，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先进女知识分子认为“剪发之事，既为世界文明国之通例，男子既割视殆尽，吾女子宜速去而无疑也。”^①而社会上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大多对剪发持反对意见，除女革命者或少数激进女学生外，社会女子中剪发者甚少。女权主义者逐渐意识到，提高妇女地位，不能仅从着装上倡导，而更应从生活、思想上更新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的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②于是大力倡导兴办女学，尤其是北京，在城内各地广建学校，当时的京师学务局“因鉴北城地安门左右，尚缺女学校，殊于附近女子求学不便，持拟在该处设立女子小学数处。”^③有人“见京中女学校学生，多系富家女子，贫富女子，多无处求学，”积极倡导建立“贫民女学”^④。在女学兴建、女权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女性在追求科学、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下，纷纷走出家庭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女学生、革命者，她们从卫生、经济及妇女解放、审美等角度分析剪发之利，这在《北京晨报》1919年12月5日《论妇女们应该剪头发》、和12月8日《我对于妇女剪发的管见》的文中都有所体现。故在社会上重新又掀起剪发高潮，当时就有人谈到，之前在故乡居住的妹子来北京前“对于头发的见地，简直与我完全一致。及至今年来到北京，呼吸几口都会的空气以后，思想都比我更维新了，大表示不满意，否认前说，并且深恶而痛疾之，……当天下午，便举行剪发大典礼”^⑤。20年代起，或用缎带束发或用珠翠宝石做成发箍套于头上（图10），或在额前留一字或垂丝式刘海（见图11）成为当时的时尚，她们寻求思想、个性解放的呼声涤荡着女子服饰上的陈规陋习。

在剪发之风的推动下，知识界又出现了“服饰要返璞归真”的呼声，留日归国女学生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积极倡导“文明新装”，即上为朴素衫袄，下穿黑色长裙，裙上不施绣纹，呈现朴素、清纯、淡雅之风，昔日繁多的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首饰一概不用。这种打扮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张恨水在其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中这样记述着：“她身上穿了一件瓦灰布皮袄，下穿黑布裙子，肩上披了一条绿色镶白边的围脖，分明是个女

^① “女子剪发议”，《社会世家》第2期，转引自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第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页。

^③ “地安门添设女子学校”，《京兆周刊》，民国十年七月三十日（1921年9月30日），第25—26页。

^④ “江君襄办一贫民女学”，《京兆周刊》，民国十年八月六日（1921年8月6日），第20页。

^⑤ 石君：“妹子的剪发”，《妇女杂志》，9卷第12号，1923年，第29-30页。

学生。”^①即使是夏天，红围脖也是女学生的最爱，如平等大学中的女学生陈国英。^②《妇女杂志》中“北京妇女之生活”一文中描写女学生装扮时指出，“最时髦的是头上分梳着两个圆髻，贴近耳后，近来也有许多剪了发的；围着青色短裙，登着革制蛮靴，腕上悬着一个带有又钏的大书包。还有一件最普通的物事，便是腥红毛织围巾。”^③此种由女学生倡导穿着的“文明新装”逐渐被城市女性视为时髦，纷纷仿效，样式亦渐变具体：“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袄，摆长不过臀，袖短露肘或露腕呈喇叭状，袖口一般为七寸，称之为倒大袖，衣服的下摆多为圆弧形，也有乎直状、尖角状，六角形等变化，略有纹式。裙为套穿式，裙上不施绣纹，初尚为黑色长裙，长及足踝，后渐短至小腿上部，取消褶摺，有时有简单绣纹。”^④至1924年，清纯的女学生装束在高校云集的北京成为时尚，“看她身上，今天换了一件蓝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下面露出两条着白袜子的圆腿来，头上也改挽了双圆髻，光脖子上，露出一排稀稀的长毫毛。”^⑤“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常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⑥即是对女学生装束的高度赞赏。可以说，剪掉发辮，着“文明新装”成为那个时代北京女子服饰的一个代表。



图 10: 珠翠宝石发箍、胸花、高跟鞋均体现出女性追求时尚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图 11: 剪发以后, 垂丝刘海流行了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种裙与清代或更早的“围系之裙”不属同类,是一种“套穿之裙”。清代之裙无论是款式还是装饰技巧均丰富多样,在穿着上亦多有讲究,多在正式场合合作礼服用或见客时穿,加在长裤和套裤之外,不缝合,穿着时需将裙腰上的扣子或绳系

^①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②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46页。

^③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5页。

^④ 转引自黄强:《中国服饰画史》,第179页。

^⑤ 张恨水:《啼笑因缘》,见《张恨水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⑥ 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第125页。

好。民国之裙属日常穿着，在淡化礼服功能的同时去掉了繁琐的装饰和做法，裙腰上缘两端用带或扣围系，原来在裙子里的长裤也逐渐消失于视线之外。

除去穿着上的根本性差别外，另一显著变化就是裙摆大小及裙身长短，社会上积极倡导女服应合乎生活之便、工作之便，且不说与清前期繁冗复杂之裙相比，仅与清末 1900—1910 年之例相较，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清末与民初部分女裙实例分析^①：

时间		名称	尺寸
清末	1900—1910	黄缎地彩绣花卉纹马面裙	裙长 100cm 下摆围 249cm
		红缎地彩绣花卉纹马面裙	裙长 89cm 下摆围 201cm
		大红缎地五彩绣花鸟纹马面裙	裙长 95cm 下摆围 192 cm
民初	1910—1930	条纹印花缎裙	裙长 83cm 下摆围 140 cm
		黑色暗花纱缎条纹	裙长 87cm 下摆围 163 cm
	20 世纪前期	蓝印花布裙	裙长 67cm 下摆围 115cm

*注：上表中所引用的部分裙实例，以相同时间段为主要对比项。

上表中的数据说明仅就民初十多年中，下裙长度和下摆的变化是较大的，再搭配袖口或紧或松、袖长或短或长的改良上衣，形成除了旗袍、女学生装等主流服饰外，在北京城里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的、非社会化的北京妇女的主要穿着。装束上虽也五花八门，但多“素陋随便，尤其是土著妇女，她们除了喜欢搽得三红七白之外，对于衣饰上并不十分讲究。她们大都穿棉布衣服，尤以青蓝两色为最普遍；上衣长垂及膝，也有长袍的，可是她们不讲究衣饰也就不讲究了”^②，很有俭朴之风，明显不同于当时受欧美时装影响和中国时装业出现的推动下上海所呈现的时装漫天之景。时人还谈到“我这回从上海往北京，沿途见人们忙迫的在田间操作，其中多数是女子，头上裹着白的或蓝色的布巾，穿着宽大的衣

^① 表中相关数据摘自包铭新：《论晚清民国时期围系之裙到套穿之裙的演变》，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②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 卷第 10 号，第 45 页。

服，……到了北京城内，情形可是不同了，常见有衣服更褴褛的妇女，领着小孩沿路掇拾布碎煤”，^①在全国刮起的解放妇女和让妇女走出家庭之风此时似乎还未完全刮到北京，这或许也与旗人聚居，饷银尚未完全取消，妇女们依附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有关吧。

（二）改良前的旗袍

伴随着民国的建立，人们在迫不及待地各方面追新求异，如满洲妇女改穿汉服、女尚男装以及女学生装和“文明新装”的问世，曾风行全京的、满族服饰的典型代表——旗袍退居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旗袍也卸去了沉重的传统负担。在保守势力和亲清势力强盛的北京，旗袍的穿着者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上层旗族妇女，如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溥杰回忆到，“还有我的两位祖母和母亲始终都着旗装。她们所用的旗装头饰上的人造花和‘两把头’（即京剧‘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的装束）以及旗装高底鞋和布袜之类，也都有专门承办的手工业者送货上门。”^②“而庆亲王载振的女眷不论平时或外出，全是纯粹满族装束”^③，样式上或遵旧制，或在衣领高低等上稍加改良。

1916—1919年以北京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京成为领导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心城市，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20年代初开始在北京流行的旗袍似乎正是这种新文化、新思想的涌动的结果。出身名门的张爱玲根据童年的记忆在《更衣记》中回忆道：“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④，上海出版的《解放画报》一幅介绍旗袍的图画边提到“近日某某二公司减价期间，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穿着五光十色的旗袍。”^⑤引领全国时尚的上海尚且如此，拥有众多遗老遗少且一直保持传统风俗的北京自然可以想像，只是在样式上不及上海的花样百出，“近来京中最流行的女服，冬天要算旗袍，春季要算长坎肩，倒也可以省却扎裙的麻烦，也还算不怎么样。”^⑥1922年“当溥仪在北京举行大婚礼时，他们全家朝贺，就完全是满族朝服装束，男的是花翎红顶，朝服跨腰刀，妇女也还是宫装旗袍，高底鞋，手持玉如意”^⑦，即使不是皇室后裔，穿旗袍、梳大板头的妇女也还不时能在北京街头看见，直到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才根本绝迹。^⑧仅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旗袍就改变了民初的没落地

^① 高山：《劳动妇女与闲散妇女的装束》，《妇女杂志》9卷第7号，1923年，第22-23页。

^② 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见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37页。

^③ 汪荣宝：《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见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92页。

^④ 张爱玲：《更衣记》，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⑤ “旗袍的来历和时髦”，《解放画报》，1921年，第7页。

^⑥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5页。

^⑦ 汪荣宝：《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见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92页。

^⑧ 肖伯清：《旗袍六十年》，见《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位，重新成为都市女子的主流服饰，北京出现“髻鬟钗朵满街香，辛亥而还尽弃藏，却怪汉人家妇女，旗袍个个斗新装”^①的情景。张恨水1924年在《世界日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中也多次提到旗袍，小说中无论坤伶、妓女、太太、小姐，还是学生都爱穿旗袍，街上跑动着的包月车“上面坐着一个丽人，穿一件葱绿印度绸的旗袍，越觉得颜色鲜明”^②，人们纷纷以穿旗袍为时髦，且别出心裁，如余瑞香新做了一件白纺绸的旗袍，很是得意，样式上“周身滚边，有两三寸宽。又不是丝辫，乃是请湘绣店里，用清水丝线，绣了一百只青蝴蝶”^③。



图12：民国初年刚从满族旗袍改良过来的旗袍，无左右开衩（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图13：没有收腰的满族式旗袍（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从以上不难发现，此时在北京流行的旗袍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其多以马甲形式出现，加在短袄上，稍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取旗人之袍形制去繁就简，衣领变矮、袍身缩短、剪掉长袖，减去镶滚装饰，面料也改为轻薄，多印花。（图12、13）甚至到20年代中叶，旗袍在轮廓上的变化依然不大，仍取清末的宽松袍身，廓形平直，几乎看不出胸、腰、臀曲线，腰节较低，其间虽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也只是袍身变短，袖口由宽大改为上贴下散式，滚边不如以前那么宽阔，一如张爱玲所言：“是严冷方正，具有清教徒的风格”^④宋庆龄在1921年所拍摄的照片中穿



图14：宋庆龄摄于1921年（摘自网络：<http://www.jcrb.com/zyw/n133/ca193470.htm>）

^① 雷梦水：《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②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13页。

^③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517页。

^④ 张爱玲：《更衣记》，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32页。

着的就是袖长过肘、袖口变小的黑色旗袍（图 14）。时髦的上海在 20 年代中后期，“受欧美服装影响，旗袍的式样也有了明显改变，如缩短长度，收紧腰身等等”^①，到“1926 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民国新旗袍最初的款式。”^②北京虽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随着运动中心的转移，亦失去了服饰的示范地位，这种旗袍式样直至 20 年代末才由上海传入，从 30 年代后慢慢演进并步入辉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服”，具体将在本文第三节中详细介绍。

至于此时受西方电影或杂志影响，由上海女影星们倡导的女子西式时装，以华丽明艳为显著特点，风行一段时间后向其他城市辐射，北京亦属其中之一。当时保守的北京里，穿着者们多非富即贵，且仅仅在小范围的社交或偶尔的正式中偶有见着，未能形成一股潮流，在此不多加赘述。

第三节 渐趋稳定时期（1928 年—1937 年）

在前文中所介绍的服饰穿着中不难发现，北京城里的服饰是混乱无序的，就穿着者本身而言，有从身份上将自己的着装归类的，也有凭自己喜好随意穿着的，并无等级之分，政府也未有正确引导，整个一“胡乱穿衣”的时代。男子有一味崇洋穿西装者，半开化半保守的中西“混搭者”、还有以“企领文装”为代表的革命者穿着；女子服饰中更是异彩纷呈，学生装、旗袍、上衣下裙或下裤、剪发或戴头饰等等，无不从外表上尽显女性魅力。而新的生长点往往在两极化构成的张力中产生，崇洋和复古、西方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相抗衡、相妥协，人们经历过服饰种类和款式上的多种实践后，开始领悟到应是“人穿衣”而非“衣穿人”，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应该具备合体实用的适宜性，洋装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成其改良，由伟人创造、集民众智慧酝酿出了两大服饰经典：中山装和旗袍，这也成为我国袍服史上最桀然的标志之一，服饰由多元走向稳定。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及首都的南迁，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首善之地，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失去了绝对的优势，从 20 年代末起，服饰整体上以中山装、长袍、旗袍为主流，时而追随于上海样式，或依旧制，在主流大潮中激荡着，未激起过多浪花。

一、中山装的定型

民初男子礼服的两种规定，直接导致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西装与长衫的并行不悖。但毕竟无论从名称上还是样式上，西装都是纯粹洋人的玩意儿，并不完全适应中国人的生

^① 周讯、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1984 年，第 306 页。

^② 包铭新、吴涓、马黎等编：《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2 页。

活特点，尤其是过惯了闲散生活的北京人。而在正式场合尤其接见外宾时若着长衫，形式陈旧且不易与封建体制区别，适宜国人的新礼服——中山装遂应运而生了。1905年宁波红帮裁缝中的张方诚在日本为孙中山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回国后，又多改制，成为七纽、立领、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接近于新军军装。（图 15）之后除掉肩部襟带，口袋改为贴袋，袋前加褶，领改为下翻立领，仍保留七纽，袖口外侧三纽为饰，长裤是前面开缝，用暗钮扣，左右各有一个大的暗插袋，裤腰处有一“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箭形袋盖扣上，裤脚是翻边的，翻领和翻边裤脚互为对应。（图 16）1923年，孙中山又加以改造，把单层的企领加长并向外翻出，类似于西装的衬衣领，在保持挺括的同时免去繁琐；从实用角度出发，将暗兜改为“琴袋”式样的明兜，并添加倒“山”字形、带扣眼的软盖，前对襟并饰五扣，这基本就是大家在电影或相片中常见到的中山装了。中山装从最初的形制到逐渐区别于学生装和军便服的最后定式，从最初的国民革命象征到政治化的服装，前后经历了近 20 年。至于中山装究竟是根据何种西装改造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改造英国式猎装而成的，有说是根据日本学生装改造而成的，还有人说是日本的铁路工人服，也有人说是借鉴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改造而成。另外还有一种与改造西装不同的说法，认为它是对满族的马褂进行改造而形成的。无可否认，中山装是吸收西方服饰因素，融以中国文化而制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



图 15: 晚年着中山装的孙中山（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图 16: 中山装（摘自袁仄：《中国服饰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一经问世后，孙中山以中山装作为礼服，穿着出席各项国务活动。随着南方革命势力影响的扩大，以及人们对孙中山崇敬之情的增长，中山装开始受到国人的喜爱，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逐步流行起来。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在各种公开的场合下，均着中山装或军装。他在 1928 年担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后，下令中山装为文官制服，并进一步赋予“革命”的涵义：四袋以同礼、义、廉、耻立国之四维，软盖以倒笔架形指以文治国，前身五粒扣子加袖口三个寓五权分立和三民主义，封闭翻领寓三省吾身、严谨治国。并规定：在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奉孙中山之法，继承孙中山遗志。在国民政府的提倡和出于对孙中山先生政治威望的敬仰，北京云集着的众多政府官员、文化人士、革命志士等纷纷效仿，“官民合一”的中山装一时成为当时的风尚，1945 年国共两党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都着中山装。中山装作为正式礼服后，还被列为公务员服式，穿着上只因社会地位和职业的不同而略有差异，社会地位较高的政府官员或地方绅士多穿毛呢中山装，春秋两季用黑色或藏青色面料，冬季外披呢大衣，夏季用浅色或白色薄呢料，戴草编礼帽。一般公务员多穿国产卡其布，春秋两季着黑色，夏季着白色或黄色，一般不戴帽，有时也穿布鞋，服饰配套上不如毛呢中山装考究。

中山装以其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的特点，逐渐成为被外国人士广泛认可的、可在各种场合穿着的中国男子正式礼服，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华民族气魄的代表服饰，流行于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衣作为社会生活之首，自然要以适于生活为主要出发点，中山装笔挺的形制似乎不能满足于平日的闲暇生活，以中山装为工作服装的人们，在工作之外更不愿意仍旧保持工作状态，中国的传统服饰——长衫，以其随意和舒适的特点在此时仍占据着半壁江山，穿着者在当时的北京城内随处可见。一些革命者、政界要人在休闲时常穿长衫，有的很少或从未见其穿西装，如蒋介石、于右任、陈布雷等。拥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北京，文人众多，他们似乎对长衫偏爱有加，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著名画家齐白石，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一身得体的长袍马褂；朱自清初到清华，见“一位清华学生在屋里只穿单大褂，将出门却套上厚厚的皮大氅”^①。适宜的长袍配上西服裤、头戴礼帽、脚踩皮鞋、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成为当时北京城内的较为典型的“有身份”之人的流行服饰，既显民族风采，又增潇洒英俊气质，于文雅之中显露精干。上穿阴丹士林的长袍、下穿西式裤子、脚穿传统中式布鞋成为“知识分子的品牌”，这种中西合璧的装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二、样式多变的旗袍

（一） 中西合璧的旗袍

从古至今，妇女的服饰本就比男子要复杂得多，也发达得多，这是由“女为悦己者容”

^① 朱自清：“初到清华记”，收入姜德明：《北京乎》下，三联书店，2005 年，第 372 页。

的思想而导致女子一直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女子之衣亦渐渐脱离“男权本位”思想，在服饰上更新传统、古为今用，再附以西方审美原则的改造，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服饰——旗袍。自清后一直作为主流服饰的旗袍在民初稍作沉寂后于 20 年代初重登舞台，初期虽较满服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打破了穿着的等级规则，其不仅是上流社会女子的主要服饰，也为城市中下层女子所爱。1929 年 4 月，民国政府再次制定“服装条例”，规定女子服饰有两款，一为上衣、单裙；一为长身旗袍，至此，旗袍正式被定为“国服”。这之后，旗袍以其开放、灵活的独特魅力独占城市女子服饰舞台，在自身的不断变化中，成为民国中后期城市女子的经典服饰。

进入 30 年代后，旗袍大放异彩，种类显著增多，在领、袖、下摆上日趋变化，变化速度之快是初期旗袍变化所未能及的。先是时兴低领，继而流行高领，即使在盛夏酷暑，薄如蝉翼的旗袍仍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令，以示时髦；而后又以低领为摩登，有的低的干脆不要领子。袖子的变化亦然，时而长过手腕，时而短至露肘，甚至还出现可长可短的卷袖式：“短袖女性在公共场所受窘者甚多，故北平女生现作旗袍时，袖口皆作长过肘二三寸，但平日时将其高卷二三折，仍将肘露出，至受干涉时放下”，^①。旗袍的长度时长时短，长时盖过脚面，走起路来衣边扫地，短制则在膝盖略上些，同时伴随着裙衩的升降，展现着女人的身姿。茅盾在其小说《子夜》中对样式上变化的新式旗袍样式这样描述：“淡青的印花的华尔纱长旗袍，深黄色绸的里子，开衩极高，行动时悠然飘拂，闪露出浑圆柔腴的大腿，这和那又高又硬，密封着颈脖，又撑住了下颏的领子形成非常明显的对照。”^② 上海的变化如此之大，跟随其而变化的北京亦必然受到影响，裙衩日见升高。

30 年代末期，又出现了一种改良旗袍，其直接受西方电影的影响，将西式服饰元素融入旗袍的裁剪与设计中，裙身开始有了胸省和腰省，打破旗袍无省的格局，同时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变得适体，甚至加入垫肩以追求完美的身材，旧式的大襟和繁琐的装饰则逐渐消失了。“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罢了”。^③而紧身无袖的旗袍，在前摆下部开了小衩，不仅方便走动，更赋动感；“花边运动”又引发的了一场领、肩、襟上缀花的旗袍革命。

改良旗袍的出现，使玲珑突兀的女性美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其设计在整体和各个细节上更趋成熟，进入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穿者年龄从儿童到少女，从青年到中老年；身份

^① 《北洋画报》，1935 年 6 月，转引自蒋雪静：《民国西化运动中的女性服饰风尚》，见《装饰》1998 年第 6 期，第 19 页。

^② 茅盾：《子夜》，见《茅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97 页。

^③ 张爱玲：《更衣记》，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卷四），第 29-30 页。

从学生到公司职员，从家庭主妇到交际明星、歌舞艺人；时间从冬季到夏季、花色从素到雅、质地由棉及丝，出现了各种能适应不同人群、场合和季节需要的服装样式，引人瞩目的宋氏三姐妹经常穿着此种旗袍出现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中。上海作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国际都市，自然成了时尚之源，服饰新潮的实践者们在上海演绎时尚的同时，亦将这一经典而又时髦的服装样式流传至北京、广州、南京等地。北京虽也受上海的影响，但因其固有的古朴民风，衣着总体呈现俭朴之风，改良旗袍的穿着者以中上流社会妇女为主，一般妇女、女学生、女职员中流行用条格织物、国产本白或毛蓝布以及风靡一时的阴丹士林蓝布做旗袍，以求素雅文静、简洁有度。1937年的《申报·每周增刊》刊有一插图（图17），系“全国妇女界在京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合影”^①，图中女子几乎全为素色旗袍，无过多复杂花纹，不同的是袖之长短。40年代中期开始，因受抗战影响，旗袍式样变化趋缓，风格向着更简朴和实用的方向发展，辉煌之景不再，至于现今社会中摇曳着的现代旗袍是在新的服装工业和服饰浪潮中发展起来的，此属后话。可以说，作为中西合璧的服饰典范——旗袍，衣领紧扣、线条舒展，辅以斜襟韵律，尽显东方女性端庄、典雅、沉静、含蓄之美，逐渐成为中式女装的“国服”经典。



图 17: (图片摘自《申报·每周增刊》第二卷第 27 期期首插图, 1937 年 7 月 11 日)

除了典雅的旗袍外，在社交场所中，薄、透、露的时装，自有一番天地，“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活跃在交际场，淡青色薄纱洋服，绣着“寸半阔的网状花边”^②。而以肩部“荷叶”流淌美丽的西式连衣裙虽也风行过，但其长下摆不及旗袍摇曳多姿，曲线不突出，仅如流星般划过中国女子服装的舞台。

^① 《申报·每周增刊》第 2 卷第 27 期，期首插图，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1937 年 7 月 11 日），第 598 页。

^② 茅盾：《子夜》，见《茅盾选集》，第 141 页。

（二） 烫发、高跟鞋等的流行

此时衣服的新奇并非是时髦与摩登的全部内容，与服装配套的装饰从头到脚，还包括了首饰、化妆与美容等，最先流行的是烫发。民国以来，女性越来越重视发式在装饰上的重要性。辛亥革命后，受男子剪辫之风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积极呼吁，社会普刮剪发之风，但在政治势力强大的北京，很快受到北洋政府整顿风俗的打击，“五四”前后至北伐战争，剪发又流行起来，那时，短发被视作进步和知识的象征，这在文中第一章的第二节中有论述过。

受 30 年代服饰华丽风的牵动和好莱坞电影的感染，飘逸的卷发取代了齐眉式短直发，被城市妇女竞相追逐，人们开始仿照欧美烫发，在上海流行的烫发风靡全国，这种舶来发式有烫成波浪式的，有烫成螺髻式的，形状有蝴蝶型亦有水柱冲天型。但北京女子多在封建礼教的熏染中成长起来，且多为文化女性或保守派，太张扬的样式还是不多见的，赶时髦者短发多为平缓的大波浪，长发者则将头发的大半烫成小卷，再用发夹或丝带束于脑后，或仅烫刘海处，如《春明外史》中写到：“梨云穿了一身浅灰哗叽的衣服，前面头发都烫着卷起来，穿了一双缎子的平底鞋子”^①，尽显妩媚之时又不失端庄。但由于当时的设备落后，是用烧热的铁制火钳横卷竖撩地将头发烫成卷、夹出浪，不小心烫了头皮和烧焦头发的事经常发生，故时常有人发表评论，禁止烫发，“烫发作蜷曲形，且须至理发店为之，费财费时，大可不必，此皆西人无意识之行为。尤非合理生活中应有之事也。”^②即便如此，北京城里的社会妇女仍“故意将头发烫得弯弯曲曲”^③。40 年代后，电烫的出现给女性的发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头发的款式由此而变得丰富起来，大波浪、油条卷、反翘式，花样繁多，千姿百态。

其次是高跟鞋。鞋子的革命起自缠足的废除起，持续了几十年，最早的出现的莫过于放足布鞋、革履与丝袜。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能挺拔身段增添妩媚的高跟鞋作为旗袍的配套装束，与刚刚复苏的旗袍一并流行起来，深受女性欢迎，从女界名流、明星，到职业妇女、家庭主妇、女学生，穿着极为普遍。30 年代的上海更是流行以跳交际舞为娱乐活动，头烫发、身穿旗袍、足踏红色高跟鞋成为专职舞女不成文的规矩，各地妇女纷纷效仿。虽然从流行之初起，就不断有人对之冷嘲热讽，并认为“尖头则脚趾磨擦皮肉损伤，易生鸡眼；跟高则脚骨压迫，基底减小，重心不稳，步行距离缩短，妨碍全身姿势，其害等于缠

^①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 18 页。

^② 聂曾纪芬述意，男其杰笔受：“对于妇女国货年之意见”，《公教妇女季刊》，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34 年 3 月 20 日）创刊号，第 44 页。

^③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 卷第 10 号，第 45 页。

足”^①，直到三四十年代还有人把高跟鞋斥为“变相的缠足”^②。但北京城里还是跟随着这一潮流兴起了高跟鞋，《京兆周刊》中在描述当时妇女服装之时就提到，“现在一般妇女，因慕西妇装，喜着高跟尖头鞋”^③。或许穿着上不得要领，往往是“勉强将高跟鞋穿得娟娟娉娉”^④，颜色以素色为主，款式上不及上海般繁多，这从当时的广告和老照片中不难发现，而普通妇女和下层社会中依旧是皮鞋或布鞋。

总体上说，旗袍的穿着在 30 年代的北京就像古典的大家闺秀般传统正派，尽显本土的拙朴。北京城内以模仿上海时尚的上流社会为源头，中等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京海合并”，下层我行我素，整体上受西化影响较小。旗袍款式没有太多花俏之处，袍身仍显宽大，用料较厚重，面料的颜色少且花色淡。穿着上多从实用角度出发，在天气寒冷之时，多在旗袍外多加一件大衣，面料或用呢料或用皮制，在风沙较大的春天则多在旗袍外加一件单大衣。但是，受清代遗风的影响，袍上装饰却比上海的来得丰富，所用材料上饰以繁复的刺绣纹样或织纹，穿着上再增添一些附加元素，如中式或西式披肩，于实用中略带讲究，求华丽和追时尚的讲究者们配以项链、耳环、戒指、手表、皮包等附件，似乎展示旗袍自身魅力多于展现女性自身魅力。

第二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的变化特点

服饰，这一位列“衣、食、住、行”之首的物质形态，自人类有始以来，从原始的兽皮到现代社会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服装，就以不同的存在形式贯穿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服饰的演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在其服饰文化中留下特有的亮点，这一个个的亮点闪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中，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服饰尤如一本图书，展现着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嬗变。20 世纪初的中国饱受了血与火的历练，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都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并由此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身体发肤上也正在悄然的进行着一场变革。虽然后者不如前者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般剧烈，但却是价值观、审美观

^① “妇女服装之改良”，《京兆周刊》25 期，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921 年 10 月 29 日），第 37 页。

^② （台）李又宁、张玉法：《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296-297 页。

^③ 同①

^④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 卷第 10 号，第 45 页。

等的人的意识层面的变革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生动的体现。

而与此同时，服饰还带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因为服饰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发生，这就涉及到服饰选择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自然环境主要指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方面，是固有的；和谐是指人在着装时必须考虑服饰与环境的适宜与统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协调”。北京的地势是西部与北部为山地丘陵，中部与东部为平原，这一特征导致的四季分布是春秋短而冬夏长。北京冬季由西北部吹来的冷空气因有高山阻挡，下沉时又有增温，对比其他同纬度地区温暖；入春后气温回升快，空气湿度降低，而温润的海洋性气流又不能及时移动到这里，于是天气干燥，土地干旱，植物生长较慢，沙土很容易便被刮起，这就必然导致春天雨水少和风沙多。所有这些构成了北京冬季干燥、春季多风、夏季多雨、秋季相对温和的城市气候特点。

也正是在这种气候的制约下，本着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原则，北京女子服饰在制衣时不得不考虑多以棉、麻等相对厚实的布料为主，以抵御长久的寒冬；而本就长久的寒冬，加上春季较多的沙尘，北京城里长久是一副灰暗、昏黄的一片，在服饰颜色选择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以青、灰、蓝、黑等与环境比较接近的颜色。而这些颜色的选择恰恰也与“孟春穿青色，孟夏穿赤色，季夏穿黄色，孟秋穿白色，孟冬穿黑色”的传统服饰礼俗相迎合。而且“北京差不多是可说没有春天的，冬天一过，接着就是夏天。在这冬夏这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人碰到一块，就会一个带着草帽，一个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园一同散步，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种现象。”^①自然条件和传统服色观导致服饰面料和颜色以及穿着式样选择上的局限性，这必然使得当时北京的服饰样式不如南方城市般绚丽多姿，而呈现出自我浓厚的地域特点。

一、服饰表现形式上的中西并存、新旧杂陈

任何文化变迁都是传统之“旧”、现实之“新”以及某些时候加上外来之“异”三者激荡之结果，传统、现实、外来这三者形成层叠、交融、并列，方能产生当下状态的文化。无论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还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北京以其宽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在民国时期呈现出来的服饰上的新旧并存性是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个总体特征。

辛亥革命的枪声虽确实打破了服饰“昭名份，辨等威”的功能，但其革命的不彻底性更直接体现在服饰上。“旧制既破，新法当立”，或许是国民政府太过于想从体制上标榜与旧有体制的不同，不管是民初还是1929年的服饰法令中，都未对人们日常的穿衣戴帽有明确的规定，有的仅仅是正式或外交场合的礼服、公务员服制的穿着规定；人们由于长期

^① 《现代评论》，1卷第25期，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925年5月30日），第11页。

受封建体制的封闭、压抑，迫切地从生活中“力所能及”的任意之处来打破常规，但此时的民国政府似乎又未能有足够的引导，人们一时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以致北京当时大街上“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①之景，真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新旧土洋、千奇百怪，一个婚礼场面中的四个陪宾“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②。之后随着政府的大力倡导、社会主流阶层的带动以及人们穿着意识上的觉醒，北京的服饰逐渐由杂乱无章的“胡乱穿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逐渐形成男子中山装与长衫并行不悖，女子旗袍占绝对主导的服饰穿着年代。男子服饰中的西装、“企领文装”、中山装是西式化产物，而中式长衫依然存在，并在北京拥有绝对优势。女子服饰上，新出现的“文明新装”和旗袍，是在旧有袄裙样式上的翻新和对满族旗袍的改良，在旧元素中彰显出新特点、新变化。



图 18: (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 第6页。)



图 19: 蔡元培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 第7页。)

可以说，服饰从其外在表现形式上无不体现出中西并存、新旧杂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不仅体现于社会群体的整体穿着中，更体现在社会个体的个体穿着中，集中西、新旧于一身。这一点在清末时就已有体现，当时被清廷污蔑为“四大寇”的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虽然是一副清朝臣民的打扮，但他们筹谋的却是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大计。(图 18) 而民初时，一些新思想的倡导者，如民初剪去发辫的蔡元培，衣着仍没改变，仍是旧式长衫(图 19)。而在普通市民们中，对新出现的穿着潮流或是一味跟随，完全西化，

^①《大公报》1912年9月8日

^②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3, 第85页。

“有少数老先生，亦制一袭西装，以资点缀，然大抵不惯，遂至束缚不自由。”^①或是在畏惧权威的心态下不伦不类地穿着西装革履，一副不中不西的打扮，一些甚至是头戴西式礼帽，身穿长袍马褂，脚踩皮鞋的集中西于一身之景，正如“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②，“最可笑者，余尝见一老先生着西装、不惯穿皮鞋，乃代以中国旧式双梁鞋”^③。此外，还有依旧顽固地穿着前朝打扮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穿青夹袍，外套天青大团龙旧缎子马褂。虽然不知这马褂系同治年间的，还是咸丰年间的，可是两袖郎当，宽大入时。他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小帽，虽然不知是丝织品，还是棉织品，却还有些油亮，大概不是一年两年的成绩。”^④

二、服饰流行或民众选择上的从众性、效仿性

在政治文化浓厚的北京社会环境中，官方文化虽比较有影响，但市民文化亦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洪流，表现在认知方式上是市民文化心理的“趋同”，或者说“从众”。从众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作出社会判断，改变态度的现象。这种群体的一致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约束力量，从而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与生活习俗。北京长久形成的“从众”心理反映在服饰穿着上，就是对原有服饰的认同，较少怀疑与变革，在所谓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更多的是对前者的维护与发扬，将社会的规范、特定的时尚与他人的榜样作为自己的着装依据，而不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爱好来选择服饰。

随着上海的开埠和租界的建立，海禁一经开放，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下，迅速成为当时的时尚之都。“欧美的服饰以当时的法国巴黎为最，而巴黎的时新服饰，在三、四个月后会流行到上海来。”^⑤服饰西化趋向十分明显，当时的《申报》的一篇文章中就刻画了当时上海的时髦男女典型装束：“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副。”^⑥而正如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宁可离开世界，也不能不合时尚”，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共同心理，服饰上对“新”的向往体现的尤为明显，各大中城市纷纷以上海

^① 《红玫瑰》，1925年第2卷第10期，转引白石磊：《近代上海服饰变迁与观念进步》，见《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第38页。

^② 《大公报》，1912年6月27日

^③ 同①

^④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10页。

^⑤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534页。

^⑥ “时髦派”，《申报》，1912年1月6日

的新奇服饰为模仿对象。一首流行俚语说到：“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不象样，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①各地服饰洋化现象日益普遍，传统的以京师官眷为全国所瞩目效尤的京派服饰也不得不放弃领导服饰潮流的地位，转而仿效上海。“本京掌柜效南装，软帽松鞋袜子长。”、“烟泡兰香纤玉捻，鞋尖花小澹金描。衣裳时样年来瘦，渐仿洋装显细腰。”^②

在高校云集的北京城内，易于接受新思想、产生新观念的学生代表装束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渐渐被社会各界认为新潮，纷纷效仿。一时间，北京的女子仿佛又找到一个导向标，各阶层盲从于女学生上衣下裙穿着的比比皆是。男子的“企领文装”、中山装和长衫亦被不同身份的人争相模仿，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服饰选择上的从众心理，企图从外形上追求知性与个性。而与此同时，当拥有绝对优势的官方文化一旦无力约束和带动促进城市文化发展时，市民们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不愿也不敢过密趋从官方文化，逐渐形成一种循规避险、平和谨慎、安于现状、求稳大于求变的市民心理，北京市民中长期形成的“求同”思想决定了北京城里长衫与中山装几乎是平分秋色，甚至略胜一筹的服饰特点。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旗袍的复苏，和上海西化风气的吹入，北京的“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③女学生们也纷纷抛弃了素雅的装束，纷纷效仿，追洋求新。1922 年北京《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曾惊呼：“北京某学校的女学生，自修室的桌上，雪花膏花露水的数目，竟比钢笔和墨水瓶的数目，要多两倍！”^④1925 年 4 月 25 日的《现代评论》中“女学生与留学生”一文中指出：“女学生与非女学生的区别，也一天天模糊起来，从前人对于女学生的观念，以为她们的长处是识字，她们的幸福是大脚，她们的短处是不会梳头，不会缝扣子。……她们虽然不把买书的钱完全买粉去，然而她们一定不肯把买粉的钱买书来”^⑤。时人提起女学生的生活时，联想起亲戚家的一个女学生，“清晨上学的时候，太阳挂的高高的，她还刚从床上起来，洗脸了，得细心的擦上一层白粉和胭脂，于是穿上一件时髦的旗袍，丝袜，擦一擦亮高跟鞋，穿上走两步，从镜子里看自己的姿态，起码梳十几分钟的烫过的头发，照上几次镜子，才拿了两本新新的洋装书，踏着有点近于跳舞的步子，一股劲儿扭着细腰去了。”^⑥女学生这一当时女性中的特殊群体，是进步思想的启蒙者，是自我解放意识觉醒的先锋者，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社会人士呢？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 2，第 15 页。

^② 雷梦水：《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第 78-79 页。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 3，第 2 页。

^④ 章洪熙：“僭越的忧虑”，《晨报副刊》，1922 年 11 月 10 日

^⑤ 西林：“女学生与留学生”，《现代评论》1 卷第 20 期，民国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43 页。

^⑥ 申抱清，“节约运动与妇女生活”，《公教妇女季刊》4 卷第 1 期，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一日（1937 年 1 月 1 日），第 9 页。

在这股风气的带动下，北京城内“眼睛虽不近视，却非戴金丝眼镜不可；天气虽未下雨，非高底皮鞋不穿”^①的盲目攀比之风日渐盛行，“身围极小，紧紧的绑缚着身子，袖却极大，一举手可以露出肘来”、“把额头上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有的意做得极高，好似一个鸟巢顶在前额”^②的怪异打扮比比皆是，较为离谱的是因爱美太甚，好奇太过，往往忘记了时令上是否合宜、生理上之是否适用，不分季节地盲目学样，尤其是北京社会妇女，“当着风雪满天的时候，偏教罗袜生尘，玉臂凝寒”，“尽管步履艰难，偏要穿着高跟鞋和缠足一般的受罪”^③。更令人瞠目的是，京中一般妇女学旗人妇女插花抹粉，“多半平常坐在家也打扮得脂粉满面，花枝盈头；甚至黄脸老妇，齿豁肉削，还一样的浓抹淡装，妃红丽白，招摇过市”^④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混乱无序、畸形发展的状况。

三、服饰变化中体现出深厚的保守性

以女子服饰而言，从文人回忆录、月份牌及老照片中，我们对上海流行旗袍的印象是身紧裙长大开衩，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是中西合璧的典范，并将西式外套、大衣、绒衫等穿在旗袍外，用料上以西洋面料为主，并颇多讲究。但其修长紧身的裙形，较适应南方女子消瘦苗条的身材特征，北京女子多高大，从裙身上来说，北京盛行的旗袍自不如上海那般紧身适体，某种程度上说，仍旧保持着清朝满服乃至中国自古以来的“宽衣博带”，裙身多呈现平直之感，似乎要保持矜持与凝练，以彰显正宗。从穿着上来说，京城女性的穿戴虽然刻意模仿上海，但式样仍不及上海般如此繁多，翻领、“V”形领、荷叶领，配以以荷叶袖、开衩袖等的旗袍在京城里几乎是见不着的，虽无明文规定，京城女子们仿佛自成一规，不越雷池。从面料上来说，上海属开埠之城，洋布较为盛行，纱、绉、绸、缎等面料极其丰富，南方已经“细布、洋布、呢绒，……花样竟为技巧，质料日见名贵，力事修饰，追逐潮流”，而北方一些地方还是而北京苦于自然天气或社会原因，用料上颇受限制，且“一衣破而补，补而烂，单而夹，夹而棉”^⑤。京城里即使套在旗袍之外的大衣，多以呢制或皮制为主，这与当时上海所流行的华贵、昂贵、样式考究的裘皮大衣是不可比拟的。从颜色上来说，上海的灯红酒绿也印称在了服饰上，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服饰中育莲色、湖色、杏子红、橄榄绿等的颜色无不体现了色彩的鲜明，而北京的服饰颜色则相对素雅，且抛弃了服色上的黑、白的禁忌，“色尚蓝、黑，灰次之”^⑥。

^① 飘萍女史著：“理想之女学生”，《妇女杂志》1卷第3号，“论说”第3页。

^② 高山：“劳动妇女与闲散妇女的装束”，《妇女杂志》9卷第7号，第23页。

^③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5—46页。

^④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4页。

^⑤ 黄成勋：《顺义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铅印本，收入《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16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⑥ 同⑤

而男子服饰上，上海风靡一时的莫过于西装了，正式场合中男子更以着燕尾服来标榜绅士之风，西式化场所中的服务者们以着简化的西式礼服为主，长袍和中山装也时有穿着者。北京相比于上海，从权威上规定的较早，依政令实施的也早，起初也在社会上流行，但似乎未形成主流，犹如昙花一现，城里的男子穿着以长袍和中山装为两大主流，尤其是市民主体中，几乎四季“人人皆穿袍”，连城内的服饰行业中的男招待都着长袍。

因而在一些正式场合中仍能见到穿着着“福、禄、寿”字样的丝绸长袍马褂，头戴沫末的六瓣小帽男子和着滚边、盘扣旗袍的妇女。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北京冬天“逛庙”的各色人等，“有穿黑布大棉袄、头戴白毡帽或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的老乡；有穿毛蓝布罩衫、头戴海虎绒帽子、外罩黑洋缎大棉坎肩的老太太；有身穿阴丹士林大褂内着花缎棉袍、围着大红包头围巾、脚穿黑大绒骆驼鞍棉鞋的小媳妇……各式各样的人挤来挤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北京’，至少也是名居北京的外省人，太‘洋’派的人是比较少的”^①。1937 年 2 月 28 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有两副描绘旧历新年北平市街的场景图^②（图 20、图 21），从图中不难看出，北京此时的繁华不比当年，从街上人的穿着来看，依旧是棉质的略显宽松的素色长袍，头戴瓜皮帽。



图 20: 旧历新年北平商人极力点缀却依然萧条的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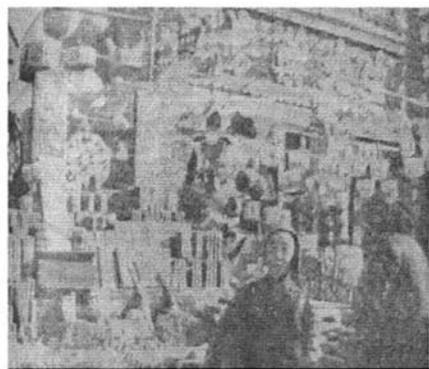


图 21: 旧历年头之北平市街

北京男女服饰上的宽松、平直、单一性正体现了服饰简朴的本土之风，女子服饰纹样“趋于艳丽中见朴素之风”^③。服饰上的这些特征，正体现了北京阶层的不同步性，或者说不同阶层的强烈反差。商政要人、公务员、教师、学生中都各服其服，且代表的是一种激进；而无论是文字的印象描述还是图片的实例记录，下层百姓和市民阶层中的穿着呈

^①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第 466 页。

^② 《申报·每周增刊》第 2 卷第 8 期，期首插图，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37 年 2 月 28 日），第 148 页。

^③ 回顾：《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 204 页。

现出的是浓厚的保守性，这与北京长久形成的特殊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第三章 导致北京服饰变迁的主要原因

从人类服饰的源起，到后来各民族各时代服饰多样丰富的发展，服饰决不仅仅是满足生活需要的器物。作为物质文化的服饰，有着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它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思潮、宗教、伦理、审美、风俗等诸多制度、观念和价值体系。马凌诺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的，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①服饰的产生及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风气都有密切关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经历了一个旧制崩析到新制探索的变革时代，服饰在泥古保守与改革求新之间交替着。导致北京服饰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受当时社会转变，活跃、开放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个体穿着心理和审美取向上的观念革新；也受北京旧的封建和保守势力的阻拦，在服饰选择上带有明显的传统保留性。可以说，在北京服饰选择上的“新”“旧”二者之间潜伏着的一条不易察觉的分界线，任何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的行为取向，都有可能使实际效果与其致力目标相差甚远。或许正是由于北京独特的城市特征，在官位文化与市民文化的撞击中走出了一条“和谐”之路。

第一节 活跃、开放的社会新思潮的带动

所谓社会思潮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在某一阶层、某一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亦随之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发展特征，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了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复古主义思潮、实验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等，数目众多，名目繁杂。在短短百余年间，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奔涌而出，各种救国方案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形成了最为激荡的时代，也是中外历史上的罕见奇观。

^①（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而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更是在受西方影响的社会思潮中由传统而现代的过渡，“只要将 1912——1949 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①。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皮鞋、高跟鞋以及钟表、眼镜、丝袜、洋伞、项链、化妆品等西式附饰物蜂拥而至，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西式服装衣料丰富，有羽纱、呢绒、绸缎、哗叽、蕾丝等，且均为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品，且价廉物美、细密光洁、颜色艳丽，丝织品中如法国的乔其纱，日本的麻纱、纱丁绸，欧美等国生产的织花锦缎、礼服呢等颇受国人喜爱。洋布令传统丝绸遭到冷遇，花布取代了费工费银的刺绣，呢绒的挺括结实使棉布失去市场，在西方科技文明的优势主导下，中国的服装产业也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变成机器化生产，并参照西方服饰文化对传统服饰进行革新，革新过程并非简单的除旧纳新，而是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服饰的精华，形成中外结合、古今交融的风范，中山装和旗袍以其中西合璧的风格，成为这一时期的典范。

北京迫于自身政治上的强大约束力和干预度，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所受到的“西化”影响虽不如租界上海和通商口岸那样直接，但此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城内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西式化”的影子。当时有一篇报道记载：“近日北平市上一般摩登妇女，因天高气爽，凉风袭人，率多喜购最流行之线织知外套，以资穿用，外表为御寒，实则此项外套既短且薄，并无御寒功效，不过以示美观耳。兹据调查，此项摩登，短外套，悉为外货，最近一月中输入北平市者，计八千余打，合为三万六千余件。”^②“西化”对服饰变化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北京城里的西方服饰穿着者身上，更体现在本土服饰布料上的“洋”化，当时登载于《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③中的一些数据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1929—1936 年北京 12 月份月平均衣服材料零售物价表^④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月白市布	60.7	56.1	60.4	54.7	57.1	58.1	48.1	54.3
青市布	68.5	62.0	65.2	60.9	68.0	66.4	55.2	59.5
灰粗洋布	49.0	48.4	52.4	53.6	58.4	56.6	52.5	55.5

^①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 页。

^② “北平最近一月内共销九万余件摩登线衣”，《公教妇女季刊》，1 卷第 3 期，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第 32 页。

^③ 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部编

^④ 此表中所有数据均摘自相应的《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衣服材料上忽略了品牌差异，仅以同种材质的布料为研究对象；物价选择上忽略了各月之间的差异，仅以每年 12 月份的平均物价为代表。

毛蓝粗洋布	55.4	52.6	56.0	57.8	66.5	67.6	61.6	62.9
白粗洋布	43.7	44.3	45.0	46.2	45.0	45.1	41.3	45.0
爱国布	53.8	51.8	48.7	46.6	50.0	56.3	46.3	48.7

*注：上表中衣服材料的丈量单位是1市尺，物价单位是铜元；此物价调查每月二次，每物取六家为对象，表中所列为其平均值。

人们对衣服布料的选择，往往以质量和价格作为主要参考因素，在当时不发达的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下，人们往往更多地以价格为优先考虑对象。通过将上表中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同为白色的白粗洋布一直低于月白市布，颜色相类的灰粗洋布的价格也一直低于青市布，即使是政府大力推行的、相对低廉的爱国布也一直高于白粗洋布。这是因为以机器大工业成批生产的商品在成本上确实低于以手工作坊式出产的同类商品，这必将导致洋布在价格上明显占有优势。就布的质量而言，且不说洋布质量上能有多好，相信以相同的原材料，在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指导下生产出来的同类产品不会比在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多少，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会相对更好。

“近年各国洋布充街塞市，致中国土产布？不能畅销”^①“普通女服所用的材料，便是印花洋布，花样时新，价值低贱，所以销售非常畅大，一般国布店里都摆得满坑满谷，可是利柜上的漏卮，从此也就难塞难补了。”^②正好说明新出现的洋布以其价廉物美的优势，吸引人们竞相购买，取代了本市布在市面上的优势地位。

以上是在新的社会思潮下，服装工业和服装产业上出现的新变化，是服饰物质层面的体现，而作为服饰穿着个体——人，受新思想的影响，自民国建立以后，人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终于摆脱了服饰的束缚，打破了人适应服饰的格局，逐渐成为服饰的主人，人们对于服饰的追求不再仅仅是为了裹身御寒，而转为彰显个性的手段，以体现自身美的价值。正如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所说，“倘若衣服之起源不因羞耻，也不因实用，可能的动机还有一个——爱美的欲望”^③。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人的感性情感需求也随着一层层包裹的剥落而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及需求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服饰和装扮，实用化、个性化的着衣观念得到宣扬。当时北京城内特定场合或特定人身上穿着的军礼服、留学生们中流行的“企领文装”和“文明新装”、一些文人和一些遗老遗少身上的长袍、外交或西式场合中的西装，以及后来出现的稳健、中庸的中山装和颇具审美内涵的旗袍都是这一“新”的穿衣意识觉醒的物化表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

^① 《京兆周刊》（第10期），民国十年七月九日（1921年7月9日），第13页。

^②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6页。

^③ （英）罗伯特·路威著，吕叔相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第81页。

种服饰的“分层”，是按身份、按社会地位来穿衣戴帽，但无可否认，除了特定的军礼服外，人们在服饰上拥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权，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新”气象。

这种穿衣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审美观，尤其是女子审美观的转变，人们开始摒弃男尊女卑的思想，追求男女平等上。女性开始摒弃传统的胸、肩、臂完全平直状态的造型，开始突出形体之美，以及女性服饰上的花样百出，表明在审美意识上，已经打破了旧有的以压抑主体为代价而求得的中和式的审美理想，在与西方思想、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的碰撞中形成了兼有审美主体、客体的双重身份，追求个性自由、体现自我的，健康、积极的审美情趣，标志着新的服饰观念已经诞生。女性可以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个性及需求自由地选择服饰，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装束，学生装、改良旗袍甚至是“薄、透、露”的服饰飘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旗袍也以其各种细部的变动来适应各类审美和个性的追求：领的高低和有无显示不同的仪态，袖的长短和有无展示不同的风姿，下部开衩不同部位和高低呈现不同的韵味。

同时，作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白衣黑裙，还突破了传统的白为丧服色，黑为寡妇服色的颜色禁忌。女子服饰在颜色上趋于淡雅，喜欢衣裙、衣裤同色，镶边多用本色或白花边，素静洁雅，而一袭灰色或黑色的罩袍和衣裙衬托出此时女性的沉稳与优雅，也表明女性对传统的大红、大紫、碧蓝等色彩的厌弃和对黑色、灰色、品蓝、暗紫等色彩的青睐。

第二节 政府倡导或对传统习惯的保留

一、政治或社会主流的影响

任何社会制度和科技的进步，必然要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而服饰行为正是其中一环。在服装产业化之前，服装的变化在总体上受制于政治的、道德的等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一旦成型后即被近乎强制地作为某种社会礼仪的符号化象征并被征用。

也许民初国会在以洋服作为礼服时，并未意识到燕尾服和圆筒礼帽的西式衣冠文化对中国传统服饰的猛烈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改革意义。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人们虽惧怕变化，依赖传统，但更畏惧权威，即使纯西式的洋装于形于神都不适应当时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北京城里的遗老遗少们还是穿起了纯西式或不中不洋的服装。而“便服听民自便”的宽松举措，让民族情结深厚的一些北京人依旧穿着长袍，与西装并行不悖。但在中

国这样的服饰曾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化中，规矩与规范是不能没有的，不中不西的穿着打扮更是不被允许的，必将遭致政府的干涉。如 1917 年北京警察厅就曾发布公告：“查近来衣服式样竟为奇异，几于不中不西。而妇女衣服日趋紧小，亦殊失大家风范。”“若于公共集合场所服之游行，实于风俗观瞻两有妨害”，因此“永禁“穿着。^①之后，又以权力的权威结合民众的智慧，确立了那个年代的国服——中山装和旗袍，北京城内也逐渐呈现出男子着中山装、西装，女子旗袍或上衣下裙的服饰穿着方式。可以说，即使是相对开化的民国政府，亦未能摆脱在服饰上对国人束缚的宿命，政治对北京服饰独特影响的传统并未消失。

可以说，政治对服装的影响异常敏感，不管权力是来自民众或统治阶级，在民众的服装中都会有明显的反映，这可以从当时统计的北京生活费指数体现出来，具体见下表：

1926—1936 年北平生活费指数表^②

	衣服	总生活费
民国十五年（1926）	95.3	102.0
民国十六年（1927）	100.0	100.0
民国十七年（1928）	105.3	101.6
民国十八年（1929）	114.5	106.5
民国十九年（1930）	113.1	109.6
民国二十年（1931）	114.4	95.8
民国二十一年（1932）	113.4	91.2
民国二十二年（1933）	106.2	81.0
民国二十三年（1934）	99.6	79.5
民国二十四年（1935）	95.2	85.9
民国二十五年（1936）	97.1	100.2

*注：上表中的数据均以物品的银元价计算，并以 1927 年为基数 100。

通过对上面的数据分析后，不难发现，从 1928 年起到 1935 年，北京市民们的衣服费用指数明显高于总生活费，这与 1927 年的首都迁都不无关系。或许从名义上来说，当时的北京不是“天子脚下”，政治权威相对降低，而政治的变动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思

^① “警界维持风化”，《申报》，1917 年 8 月 19 日

^② 表中数据均摘自《北平生活费指数表》1926—1936 年每年公布的数据。

想宽松、经济繁荣的时代，往往也是人们的服饰美学思想活跃的时期，社会个体对服饰的关注度较高，个性化服饰也相对丰富得多。而临近 1937 年“七七事变”引发全面抗战，衣服费用指数又有所回落。

同时，在政治意味远大于文化意味的衣着时代，服饰之潮流其实已经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当社会更替，王朝革命或新制度诞生的时候，领袖服饰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可以引发世人对这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人们似乎希望通过在服饰上模仿所尊重的权威者、名人，迎合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以在心理上获得与其同等优越地位的心理慰藉，通过对美、时髦的模仿，来获得被赞誉的喜悦。长久以来，北京以其固有的历史传统，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官方的服饰穿着势必吸引市民争相效仿，比如孙中山授意创造并率先穿着的中山装。而同作为文化之都的代表，北京又是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以“长衫”代表学问的穿着“潜规则”使得大量文坛才子们无论何种场合都以长衫出现，而对新出现的西装大肆批判，显然，这些主流服饰无不带领着古都中人们的穿着风气。

二、保守势力对传统的保留

北京是满族的聚居地、旧王朝的政治中心，自然成为封建传统势力坚守的堡垒，成为用服饰来显示尊卑贵贱最为理想的舞台。正统而保守的文化，钳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较强的思想控制力和较大的政府干预度，使西方商品经济、思想文化传播、渗透时间相对略晚，服饰变迁上必然带有自身的国都特性，主要表现在封建保守势力在社会着装效应心理上对“旧”长袍的推崇，对“新”服饰的批判。这种心理是由注重从着装人的身份、地位来评价服饰美丑的传统观念中派生出来的，逐渐构成具有地域性共同的社会心理效应。

由于中国自古十分重视服饰的理学(即社会政治观念)意义，把穿衣戴帽绝不看作是个人的日常小事，而是作为个人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对个人认同程度的一种标志。因此，人们对着装社会效果的重视往往要超过对服装本身价值的重视。这一点延续到近现代社会，便出现了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孔乙己至死也不肯脱掉“长衫”的行为。这是因为，在主人公所生活的清末年代里，“长衫”是读书人的标志，能产生人们把着装者看作是读书人的社会效应。而拥有悠久古都特殊地位的北京，又是保守势力、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莫不以穿长袍作为学者身份的标识，在潜意识里将其定为本土的特色服饰，并以其强大的文化优势使外人“同化”，《春明外史》中自称为“二十世纪奋斗的青年”、“改造文化的急先锋”、《凉报》社外编辑的席后颜虽是湖南人，但平时老“穿一件竹布长衫，蓝色变白，白色变灰，满身都是墨迹油点”^①，这股风气甚至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

^①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 32 页。

即使西风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他们对本民族的传统仍持牢固而坚守的态度，不论男女，皆如此，均对洋服不屑一顾，认为“尊卑一式，贵贱难分”，不胜中国服饰之“绸缎凌罗，异常灿烂”，梁实秋认为“将一切重量载与肩上令衣服自然下垂的中服是惟一的合理的人类的服装”^①，林语堂还在《西装之不合人道》中指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为摩登女士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之物之名，而好为之‘颺’。”^②并一再强调最高贵的华人以穿长袍马褂为荣。

而当时女子的装束，在许多保守派看来，为社会所不容，常常受到舆论的谴责。当时的报刊杂志中纷纷刊登时人对女子时髦服饰的批判：“近日妇女仿效西人露背露腿，着高跟鞋，长丝袜，殊属无谓。”^③“血红的嘴唇，青白的脸，卷着的发，都是妖气的表现，并不能增加你们的美，这正如小脚妇女一样的丑陋，难看，失掉自然的丰韵。”^④有的甚至以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对时髦装束的批判到达极至，关于这一点，鲁迅是这样说的：“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多“只字”）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原“促”此本做“催”）命符，是镗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⑤即便在容易接受新潮的知识分子中，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接受新观念的。他们中一些人在惶惑中自嘲道：“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们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⑥“旧”的保守个体们以自身的“旧”姿态反对“新”事物，对当时北京服饰中西装的短暂流行，长衫的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

三、固有的社会结构

城市内部的异质性和分化是城市研究的基本内容，而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城市异质和分化的根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逐渐取消了八旗制度，大部分满族人被减俸停禄后，收入不固定，从事诸如拉车、苦力等无需特别技能的体力劳动，生活十分困苦。“北平的贫民，固然有一部分旗人，原来住在这些地方（如营房）。但大部分贫民却是为地价房租的飞涨，一再为较为富裕的人家驱逐，只得迁移到交通闭塞、生趣全无的城根去。”^⑦满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自不能如之前那样保持服饰上的倡导性和权威性。即便如此，

^① 转引自魏鹏举：《时装：消费社会的身体寓言》，见《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99页。

^② 林语堂：《林语堂文集》，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③ 聂曾纪芬述意，男其杰笔受：“对于妇女国货年之意见”，《公教妇女季刊》，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34年3月20日）创刊号，第44页。

^④ “秋风中想到的几句话”，《公教妇女季刊》3卷第4期，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一日（1936年10月1日），第30页。

^⑤ 鲁迅：《洋服的没落》，收于《鲁迅杂文全集·花边文学》，第662页。

^⑥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274页。

^⑦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转引自王均、祝功武：《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见《地理学报》1999年第1期，第73页。

“由于官吏、工商业者、无技术劳工等的低隔离状态，使得北京虽有内外城的行政和商业的对比，并未显示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①，此时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远没有出现上海式的变动，女性没有脱离传统的家庭生活轨道，有限的社会妇女也未能引领女性服饰潮流。

从上海服饰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上海时装的领跑者是红及一时的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或名艺人等，每一有新款服饰出现，她们自然是最早的穿戴者。同时，上海的大众传媒为新服饰的流行推波助澜。单以女子报刊来说，20世纪初已达40余种，推动妇女时尚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良友》、《玲珑》等，民国种类增加更快，有《女报》、《女铎报》、《妇女时报》、《红玫瑰》、《香艳杂志》、《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月刊》、《妇女杂志》、《妇女共鸣》等等，这些报刊在传播服装信息、推动新式服装流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如《申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除辟有女性专栏讨论妇女问题外，还常有女性时装、妆饰等方面的推介和讨论。

然而此时的北京却不是如此，北京说到底还是一个不太开化的城市，而且封建残留和保守势力较上海多，况又未能直接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舞厅、俱乐部、影剧院、游艺场等西式化的公众活动相对较少，没有太多让交际女星、舞女们施展的空间，故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女性自然不如上海那样多，有数据统计，北京“为社会服劳的女人，除掉少数女教员外，便算看护妇和女伙计，京中大小医院也有二十来个，不过用女看护的还是那些外国医院，人数当然很少了。女伙计只在四城各电话局中充当接线员，此外服务于私家商店的只有151公司和正阳公司两家，这更是少而又少，总共也不过二三十人罢了。”^②30年代的北京，大部分的女性依然被禁锢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真正走出家庭以职业谋生的女性少之又少。1932年，北京市公安局对市区户籍中职业妇女的情况作了一个统计^③，当时北平市内的职业女性只占全市适龄女性（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2%左右。主要的职业类别包括：女职员、女教师、女招待、女工、女簿记书记、坤伶、鼓姬等。在这个统计中，女招待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女性职业，占了当时北平市所有职业女性的14%^④。女招待作为一种新兴的女性职业，1928年才首次在北京出现，但当时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到1930年2月才被认可，此后一两年是女招待发展的最盛时期。从时间上来看，女招待的盛行略晚于服饰上的变革；从产生的原由来看，女招待最初出来工作多是出于家境困窘等经济上的原因，与上层精英们倡导的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初衷并不相符。基于这两点，女招待

^① 章英华：“二十世纪初北京的内部结构：社会区位的分析”，《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第77页。

^② 宋化欧：“北京妇女之生活”，《妇女杂志》，12卷第10号，第41页。

^③ 这次统计仅限于有北平市区户籍的女性范畴，不包括那些外省来北京工作的女性，所以统计的数字并不全面。例如女招待的数目就大大少于北京城中实际的女招待人数。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北平女性职业的面貌。

^④ “北平市有职业妇女春季新统计”《北平晨报》，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1932年4月22日）

自然不能引领当时北京的女子服饰潮流。

而北京的一些职业妇女中，最特殊和最普遍的莫过于倡优两种。“优”指戏曲演员，此属相对上等职业，在本地娱乐——京剧盛行的北京，戏院自然成为闲逸之人寻开心之地。从京剧流行之初起，学唱京剧者多是女子，因“剧本”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服——戏服，相互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看唱功，而不在服饰上争奇斗艳，这与上海交际明星以艳丽的服饰和优美的舞姿吸引来客有根本的不同。京剧的博大精深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像舞姿那样易模仿或速成，靠的是天分、苦练和“伯乐”的赏识，能以此为职业的本就不多，更何况学唱者多为贫家女子，在当时的观念看来，女子出来抛头露面多遭冷嘲热讽，若不是为挣钱养家，是不会操此业的，这些女子即便手头有所盈余，亦不会在外表上穷尽奢华。而另一种职业——倡，指“娼妓”，在当时的北京尤其盛行，甚至多过于优伶，究其原因倒也不觉稀奇，从主观来说，她们本就生计困难，自身无技傍身，经济不太发达的北京又未能如上海那样有工厂或娱乐场能提供就业之地，只能靠皮肉谋生；就客观现实而言，北京虽从 1927 年开始到建国前不是首都，但依然是文人政客的聚集之地，以其独特的文化性吸引着众多旅客前来，流动人口相当大，从人口结构上来说以成年男性为主，多好寻花问柳。再加上有被当时的警厅默许的“公娼”，故供给量与需求量相扶并长，导致下层妇女以此为生，她们自身的因素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北京服饰的领路者，穿着上或学学生们的淡雅宜人，或“漆黑一条辫子，前面的刘海，梳到眉毛上，越显得这张脸雪白。身上穿了一套月白华丝葛夹袄夹裤”^①，以显得玲珑可爱。

这种情况形成于历史，积淀成习惯，最终以比较稳定成熟的文化方式，对乃至现代北京人的穿衣心理和审美取向等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而又无时不在的深刻影响，并在人们心目中普遍形成了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服饰穿着心理定势，这方面的原因恐怕是其它城市所不具有的。

^① 张恨水：《春明外史》（上），第 6 页。

结 语

从本质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礼”文化，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也可理解为一种礼仪文化，因此服饰不再是单纯的服饰而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政治、道德规范甚至宇宙观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服用功能服从于社会功能，并历经数千年至清末已演变为等级森严、消灭人性的僵化、腐朽制度。在进入工业社会后，这种“服饰”严重制约了经济、文化、体育甚至军事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落后的标志。民国初期对服饰的改革与其说是传统服饰在形式上的改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又一次正面交锋，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全方位渗透的结果，而中国对西方文化也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洋为中用，以代表社会转型的中山装和象征审美变迁的旗袍为代表，一种具有西方审美原则的服饰被赋予了中国特色意义，这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各种矛盾调和的结果，更是时代的选择。

而一个城市的服饰，与城市精神相维系，是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化缩影，其既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又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是资本、物质文明与技术、现代性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交融的生动历史和符号体现，是时代的变迁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的服饰，顺应了民国时期整体的从传统走向多元，从多元走向稳定的总体特征，“新”成分大量涌现，又带有相应的地域特点。同时，衣着服饰开始逐渐表现出对人的回归与关怀，开始成为人的思想、心态、习俗、观念的直观反映，反映了一个时代或某个人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是最鲜明直接的社会风情画和人物素描。民众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衣着平等权，而且还使捆绑在中国女性身上数千年的封建枷锁被彻底打破，不但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与褒扬，更是“衣穿人”的终结和“人穿衣”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服饰始终是与政治相关联的，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人们对服饰的关注度相对减少，服饰自然不如二三十年代那样异彩纷呈。但这并不意味着服饰变化的终结，而是进入一个个新的发展阶段，由解放战争后火红年代下的单调衣着而绚烂多姿的现代穿着等等，以物化的形式书写着各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著作：

- 1、《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
- 4、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
- 5、陈翔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太平洋书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
- 7、程英：《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中华书局，1962年。
-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
- 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 10、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11、（台）李又宁、张玉法：《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 12、（台）秦孝仪：《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民国七十年（1981年）。
- 13、小横香室主人：《清代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
- 14、茅盾：《茅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 15、杨米人等著，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京华百二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16、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 17、（英）罗伯特·路威著，吕叔相译：《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
- 18、郁达夫：《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
- 19、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 20、周讯、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学林出版社，1984年。
- 21、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 22、张恨水：《张恨水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
- 23、（明）史玄、（清）夏仁虎、阙名：《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 24、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
- 25、雷梦水：《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 26、(法)罗兰·巴特著,董学文、王葵译:《符号学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 27、(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丽编译:《中国女性史》,三秦出版社,1987年。
- 28、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
- 29、周汛、高春明《中国服饰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
- 30、《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 31、回顾:《中国丝绸纹样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0年。
- 32、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 3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3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35、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
- 36、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37、林语堂:《林语堂文集》,作家出版社,1995年。
- 38、《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 39、包铭新、吴涓、马黎等编:《中国旗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 40、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
- 41、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42、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中华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43、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44、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 45、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 46、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
- 47、刘清敏:《服饰文化理论研究》,大连出版社,2000年。
- 48、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出版社,2000年。
- 49、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
- 50、李之檀:《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
- 51、仲富兰主编:《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学林出版社,2001年。
- 52、(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
- 53、华梅:《服装美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
- 54、李喜所:《中国控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
- 55、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 56、华梅《服饰心理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
- 57、张恨水：《春明外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
- 58、袁仄：《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
- 59、华梅：《服饰社会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
- 60、姜德明：《北京乎》，三联书店，2005年。
- 61、张宪文：《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62、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 63、黄强：《中国服饰画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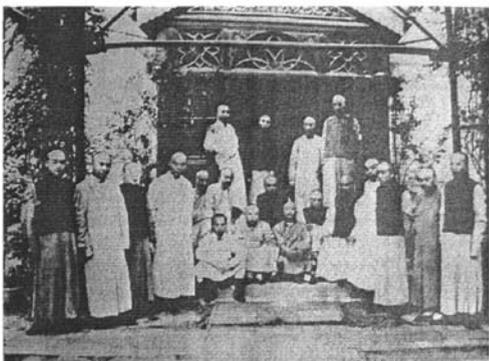
报刊杂志：

- 1、《申报》
- 2、《大公报》
- 3、《政府公报》
- 4、《解放画报》
- 5、《北京晨报》
- 6、《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
- 7、《申报·每周增刊》
- 8、《晨报副刊》
- 9、《京兆周刊》
- 10、《公教妇女季刊》
- 11、《现代评论》
- 12、《妇女杂志》

论文：

- 1、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54-58页。
- 2、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47-53页。
- 3、张法：《中国服饰：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见《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65-68页。
- 4、蒋雪静：《民国西化运动中的女性服饰风尚》，见《装饰》，1998年第6期，第17-20页。

- 5、李跃乾：《论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123-127页。
- 6、王均、祝功武：《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见《地理学报》，1999年第1期，第69-76页。
- 7、宋媛：《论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见《哈尔滨学报》，2002年第5期，第136-140页。
- 8、盛羽：《旗袍的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初探》，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92-95页。
- 9、石磊：《近代上海服饰变迁与观念进步》，见《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第36-39页。
- 10、孙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服饰变革》，见《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7-59页。
- 11、刘宁：《中国近代服饰的审美变迁》，见《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4-27页。
- 12、魏鹏举：《时装：消费社会的身体寓言》，见《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99-104页。
- 13、包铭新：《论晚清民国时期围系之裙到套穿之裙的演变》，见《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7页。
- 14、郑永福、吕美颐：《论民国时期影响女性服饰演变的诸因素》，见《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第162-167页。



附图 1: 清末学子穿着各式各样的长袍马褂(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25 页。)



附图 2: 官僚穿的长袍马褂比书生的要华丽多了(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25 页。)



附图 3: 冬季与长袍马褂相配的多是瓜皮帽和皮帽(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2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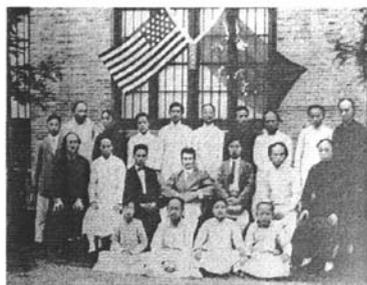


附图 4: 戴瓜皮帽的黄遵宪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可他的变法思想和诗歌创作却非同寻常。他曾参加强学会,创办《时务报》,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5 页。)



附图 5: 这几位京师译学馆的文弱书生穿上如此地道的马褂,是否还能找到当年满人纵马驰骋、箭出弦上的风采(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5 页。)

附图 6: 京师译学院(国立外语学校)的学生“西化”最快(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7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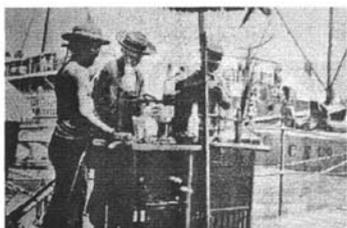
附图 7: 20 世纪初留学生中穿西装的逐渐多起来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62 页。)



附图 8: 1905 年, 自俄国归沪的游子着西装合影留念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62 页。)



附图 9: 清末北京官衙前的贵族子弟, 虽然拖着小辫子, 但服装很洋气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77 页。)



附图 10: 虽然梳着长辫子, 但头上的礼帽却是时髦货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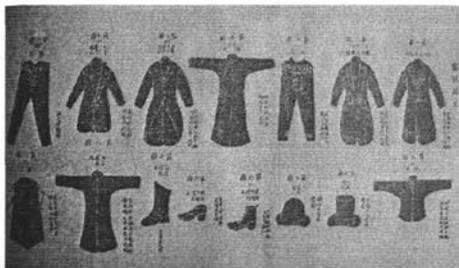
附图 11: 清末满族少女于服装和头饰别出心裁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74 页。)



附图 12: 三个着男子装束的女子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73 页。)



附图 13: 清末改制后的军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33 页。)



附图 14: 民国服制 (摘自袁仄:《中国服饰史》,第 139 页。)

附图 15: 着元帅服的孙中山(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4 页。)



附图 16: 民国初年军政界礼服(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94 页。)



附图 17: 着军礼服的黎元洪(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5 页。)



附图 18: 着军礼服的张作霖(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6 页。)

附图 19: 着军服的段芝贵(曾任京师卫戍司令、京畿警备总怀念、陆军总长等职,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7 页。)



备司令等职,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7 页。)



附图 21: 外国人帮助中国人剪辫(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81 页。)



附图 22: 西装、领带、皮鞋、礼帽, 都是当时所流行的(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86 页。)



附图 23: 剪掉辫子、戴眼镜、戴圆帽也时髦(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84 页。)



附图 24: 民国初年中分头、西装革履是时尚的打扮(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86 页。)



附图 25: 孙中山着西装像(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92 页。)



附图 26: 着中装、打领带的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立法院长、行政院长、考试院长等职,图片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26 页。)



附图 27: 施肇基(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27 页。)



附图 28: 左:王正廷(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右:章士钊(曾主持《民立报》,创办《甲寅》月刊,在国民政府的教育、司法部门担任过多种要职)(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27 页。)



附图 29: 着西装、打领带的冯友兰(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图片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28 页。)



附图 30: 桥梁设计和建造专家茅以昇(摘自胡铭,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第 28 页。)



附图 31: 着西装、戴领结的黎元洪(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29 页。)



附图 32: 着西装的张学良, 摄于 1924 年夏的北京(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27 页。)



附图 33: 谭延闿(曾任北伐联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28 页。)



附图 34: 朱有济(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江海关监督,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19 页。)



附图 35: 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 衣装稍改, 小帽依旧(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8 页。)



附图 36: 着中装的蒋梦麟(曾任国民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25 页。)



附图 37: 着“企领文装”的唐绍仪(曾任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 图片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31 页。)



附图 38: 留日中国学生着学生装(摘自袁仄:《中国服饰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 第 141 页。)



附图 39: 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的街头赌钱(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8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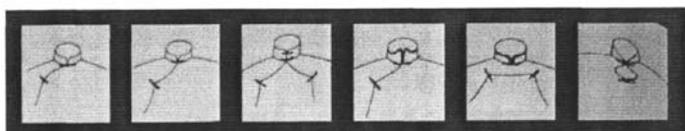
附图 40: “华洋杂处”, 服装头饰斗奇争艳(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8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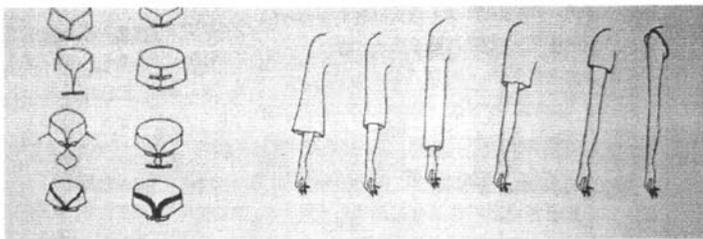
附图 41: 民国男女官员着装各取所好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93 页。)



附图 42: 民国初年一个女眷众多的家庭,他们的服装用料仍是国货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第 9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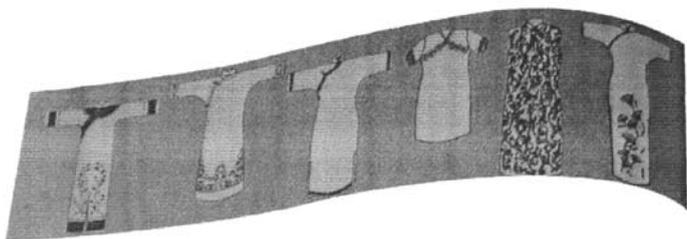
衣襟的变化



衣领的变化

袖形的变化

附图 43: 衣襟、领形和袖形的变化
(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第 154 页。)



附图 44: 旗袍整体造型的演变
(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第 154 页。)



附图 45: 19 世纪末—20 世纪 30 年代的各式旗袍
(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第 155 页。)



附图 43: 1918 年的女装不但领子短下来了, 发型更新潮, 而且露出皓皓玉腕, 戴上了手表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107 页。)



附图 44: 20 年代镶边旗袍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134 页。)



附图 45: 文明新装 (摘自袁仄:《中国服饰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 第 143 页。)



附图 46: 政界名流着中山装 (摘自王东霞:《百年中国社会图谱——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 第 100 页。)



附图 47: 20 年代女学生与老师的合影——女学生的衣着以旗袍为多, 且多为长袖, 都是着职业装。(摘自黄强:《中国服饰画史》, 第 183 页。)



附图 48: 1925 年左右长马甲式旗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64 页。)



附图 49: 1926 年左右宽袖、镶花边旗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68 页。)



附图 50: 1928 年左右窄袖、长至膝盖处的旗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 第 69 页。)



附图 51: 20 年代裙装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84 页。)



附图 52: 30 年代裙装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86 页。)



附图 53: 30 年代圆领、荷叶边袖旗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83 页。)



附图 54: 30 年代女式裙装 (摘自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5 年, 第 149 页。)



附图 55: 30 年代为推行国货而举行的裙装服装表演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90 页。)



附图 56: 1932 年左右女子烫发, 着镶花边旗袍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71 页。)



附图 57: 30 年代穿西式大衣的女留学生 (摘自胡铭, 秦青:《民国社会风情图 (服饰卷)》, 第 60 页。)

致 谢

本论文是在导师宋卫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本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论文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的亲切关心和大力帮助。在此感谢郗志群、孙文泱、付冉等老师的指导和关心，感谢江岚、武茂昌、孔凡英、欧阳亮、赵晨昕以及潘强等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论文的完成过程中，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感谢父母一直以来无私的关怀，是你们给了我前行的强大动力。

最后对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再次致以最衷心的感谢！